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10月30日第59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

书海泛舟

张光渝 梦断乌托邦——读几本文革造反派回忆录

张 从 浅谈《历史拒绝遗忘》的特点与意义

史实考订

湖滨散人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吗？

阅史漫笔

何 蜀 文革历史写作中一些历史名词的使用问题

编读往来

李嘉邻谈 57 期周文川交代材料

【史林一叶】

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述略

杜钧福

1964年我从北大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当研究生，并在这里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但我不是领头人物，也缺乏充分资料，所以对中国科学院（以后或按当时叫法简称科学院）的文革进程只有个大致了解，今简述之。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建国后按照苏联科学院的模式，在接受民国时期一些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作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1955年院内建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郭沫若为院长，文革开始时张劲夫为党委书记、副院长。科学院还收留了不少“犯了错误”

的高级干部在此担任领导，如前山西省长裴丽生、前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前吉林省委副书记李德仲，都是院党委委员。而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明远，则担任科学院北郊办公室主任。李德仲第一次来院与群众见面时，自我介绍他是“坐降落伞下来的”。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遭遇过挫折，言行都不太左，所以科学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尚比较平稳，在反右运动中打的右派分子也不很多，高校打的右派分配到我们这里也还过得去。

中央把科学院当作可有可无的部门，因为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在执政党的话语系统里还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党的领导关系中，一直把科学院放在宣传口。因为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这样放也有道理。但是，科学院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实际贡献甚巨。特别是人造卫星，在开始时期是以科学院为主的。为发展尖端科学，科学院于1960年成立了新技术局，以胡乔木夫人谷羽为局长，领导一些基础科学和新技术的所。其余的所归计划局领导。可能通过胡乔木，新技术局和国防工办挂上了钩，在器材供应上列为“〇四单位”。这个“〇四单位”的介绍信，在一些小地方管用，在上海那种地方就没人理。那时候没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连普通的电子管也分三级：军用、专用和民用。一般科研单位只供应专用。

科学院建立之初，北京的研究所分散各处。1958年以后，几个主要所搬迁到中关村，后来又在北郊建设了几个所，但重心仍在中关村，与北大、清华为邻。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仍留城内。我们一些单身职工当时住在中关村88楼（原址在现四环路中关村三桥西南角），1966年7月25日晚间听北边人声鼎沸，半边天都被灯光照亮，原来是北大东操场开大会，江青等领导人都来了。1968年3月29日夜里北大开始武斗，入夜之后嘈杂之声也传到我们这里。那时候城市污染不严重，光和声波都能传很远。

这样的环境使得科学院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单位有两个职工，家属在房山的原子能所二部（就是今天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就因为他们常回中关村家里，得风气之先，在本单位造反走在前头，被打为“反革命”，占该单位“三家村”之二。

应地所事件

中国科学院文革初期的主要事件是应地所事件和化冶所事件。

应地所是应用地球物理所的简称，是现在空间中心的前身，当时位于西苑。关于应地所事件详情，可见拙文《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现简述之。

因为文革开始时科学院保卫部对各所所有人员“政治排队”的布置被泄漏，

也因为应地所保卫处长董如江因思维障碍说一些涉及政治的胡话，以该所政治部宣传干事、转业军人王锡鹏为首的一些青年人在文革初期紧张气氛下，怀疑科学院里有人参与政治阴谋，于是将董“保护”起来，以免被灭口，称为董如江事件。

又因院领导布置在6月20日以后全体人员下乡参加麦收，王锡鹏等人怀疑也是个阴谋，因为此时麦收季节已过。他们于19日乘卡车到中关村向群众宣传抵制此事。此时，科学院领导已将他们内定为反革命。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主要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肯定谈到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对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吴明瑜等：《汪志华》，中国科学院网站）

这个保护科学家的条例未完成，但是院领导确实有保护科学家的意愿，在遇到猛烈的群众运动冲击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抛出几个著名科学家当靶子以保护自己。从这一点来说，以张劲夫为首的科学院党委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集体。

因当时周恩来出国访问，6月23日院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力著《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两位副总理对此作出了指示。院领导据此制定了“反击”方案。

他们按照北大的模式，安排了应地所一位行政干部吴智诚在23日晚上贴出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罪行”的大字报，翌日出版了一期《科学报号外》，登载了这张大字报，还发了题为《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号外》共点了六个人的名字：赵子善、王锡鹏、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后四人是研究室里的研究人员。赵子善是前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参加王锡鹏等人的活动，加上他一个算当权派。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监禁起来。这种非法监禁有一个中性的名称：行政看管。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6月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事件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6月27日左右，下去麦收劳动的院里其它所的人员陆续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了。周末不休息开会，发下《科学报号外》学习，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

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

6月28日，陈伯达来到应地所，质问为什么抓人，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六个人嘛！”（韩钟昆著《裴丽生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7月1日，王锡鹏等被放出，但仍被批斗。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向中央进行了申诉。

“七三〇”科技界大会

1966年7月初，周恩来外出访问回国，开始涉足文革领导，对运动方向进行调整。7月8日，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复查应地所问题。27日该小组得出结论，仍维持原来定性（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斗争张劲夫反党集团筹备组《中国科学院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1956-1966》，1967）。但从7月中旬以后就实际上停止了对王锡鹏等和其它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开始正常业务工作。

此时，文革初期的“五十天”已进入退却阶段。和其他系统一样，领导悄悄地扭转运动方向，当时被称为“转弯子”。对于前期被批判的那些人，无论领导和群众都相信他们仍是反革命，只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而已。

7月18日，张劲夫作了“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四大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仍坚持两所事件定性：“在这期间，应地所、化冶所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着文化革命旗帜，反对文化大革命，浑水摸鱼，篡夺领导权，拦腰一冲，两单位运动无法正常发展下去。革命派被迫斗争，很快夺回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排除了干扰，把运动重新引入正确方向。绝大多数单位，还是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直到现在。”

对于当前运动，他说：“好多同志对‘十四条’提出意见，希望进一步提。对‘七十二条’、研究生制度也提出意见。‘七十二条’有严重错误，希望大家批判。研究生是全国的制度，须向上级反映。院里暂时停止招生。”

所说的“十四条”，是1961年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提出、经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七十二条”，是科学院1964年制订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都是大跃进失败后执行比较务实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七十二条”是科学院文件，所以张劲夫承认有错误，对于“十四条”，实际也鼓励批判。

张劲夫还宣布，院党委委员杜润生（秘书长）和卫一清停职检查。后来很快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斗争。

1966年初，院部从城里文津街迁至西郊友谊宾馆北楼。7月中旬以后，科学院在这里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所有大字报均不提前期的“反击”，大多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如批判钱三强的“红专矢量论”（说红是矢量的指向，专是矢量的大小）。还有一位什么所里的司机贴大字报说，就是这些研究生最可恨了，应该把他们全都送到越南前线去。

此时已经暗流涌动，特别是7月下旬以来北大局势的迅速发展鼓励了那些开始造反后来又被批判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反革命”。而如果自己不是“反革命”，造成这一切的领导又是什么呢？

继7月29日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市委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7月30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说东方无产阶级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说这些问题。

这次大会是科学院文革的转折点。此时人们看出，这次文革绝对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运动。刚恢复的业务工作又停止了。

两派的形成和斗争

1966年8月初，中关村大操场（现四环路北侧院图书馆处）首先出现电工所的大字报。因为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杨克明此时已经调到电工所，这大字报应与其有关。

嗣后，院里在大操场搭了席棚，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此后，中关村大操场便成为科学院文革运动的中心。离得远的单位经常用大汽车拉了他们所的人来此看大字报。因为运动走在前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也来此活动，支持给应地所事件翻案。他们主要是哲学所、世界宗教所、东南亚所的人。其中哲学所的王树人是北大毕业生，多次在科学院辩论会上发言。

7月31日，在大操场内的灯光球场开辩论会。一方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一方是应地所的人。当时科学院的造反派还刚刚形成，一般还不敢在应地所事件上表态。所以当时科学院的运动是靠外力推动的。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邻近的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也来此活动，曾和科学院的西郊办公室领

导发生冲突。北大学生提议 8 月 11 日晚上在灯光球场开辩论会。

此时人们的情绪已经极其兴奋激昂。灯光球场装不下，很多人站在外面旁听。会议主席是天文台的艾国祥。他也是北大的毕业生，文革后期不再热心运动，后作出成绩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这个会一直开到夜里两点半才结束。最后维护原定性的应地所保守派完全理屈词穷。会议通过致中央电，后来称为万人大会。保守派攻击说根本没有万人。实际上在对立两派中，造反派的劲头比保守派大得多，能坚持到最后，所以赢得胜利。

除去应地所事件渐渐翻案以外，新华社记者张丽君在大操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 4 月院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说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后来《解放军报》批判了这个提法，《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改口说这次会议批判了这个提法。

风向渐渐在变。除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以外，中国科技大学专门组织了一个“革命造反派”介入科学院运动。在院内，则是天文台和数学所的造反派成为中坚力量。

在科学院文革初期，带头造反的所是那些基础研究的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和尖端技术的所如自动化所。原因之一是这些所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每年有大量高校毕业生分配进来，形成造反派骨干。有些所甚至一年有百人进所。其二是这些所都处于中关村，得风气之先，而地理所、遗传所等所远在北郊。其三，是这些做定量研究的所里的人习惯于思辨性思维，和做定性研究（生物、地学）的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这一点，和反右斗争中学校里物理系的右派多一个道理。

在天文台和数学所，保守派根本形不成队伍。少数所如化学所造反派很孤立，为保守派大本营。多数所为造反、保守两派对立。只有电子所比较特殊。该所原是南北两所合并成立的，在文革初期按原来所属的所分成南北两派。

从人员类别说，造反派多是近年来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中造反比例也很大。也有一部份如王锡鹏这样转业军人参加。至于保守派，则以干部党员居多，领头的有很多复员转业军人。科学院里的工人发动较晚，但后来多参加造反派。

大操场辩论会

8 月 14 日，周恩来接见应地所事件当事人中的赵子善、王锡鹏、范天锡、章公亮四人。原排在最后的吴蓉璋是中国科技大学 1963 年毕业生，是这伙“反革命”中最年青的，当局在“反击”中采取分化策略，策动她“反戈一击”。所

以直到8月初，她还到处检讨，说自己就是“反革命”。可能因为这个，周恩来没接见她。至于另一女士田淑清也没被接见，也许是被“陪绑”了。这一接见是周恩来正式直接介入科学院运动的开始，也大大鼓舞了造反派。

8月18日在大操场开辩论会，因为灯光球场嫌小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刘西尧明显偏袒造反派。8月25日，科学院13单位造反派在此联合开大会，声讨院党委，并提出罢张劲夫的官，部分群众还涌到院部“造反”，闹了一晚上。

作为反击，8月30日，全院保守派3000多人在大操场集会，会后结队到各所游行，“宣传十六条”，并就此成立全院的保守派组织“串联队”。在这之后，造反派才成立所、院两级的群众组织。

经一段时间的调研后，周恩来决定开科学院的全体辩论会。会议仍在大操场开。大操场和毗邻的动物所间开一个小门供他出入（因周恩来的车不能直接开到大操场，只能开到动物所，在那里休息后从这小门进入大操场。小门紧靠临时搭的主席台）。第一次会在9月5日晚间举行。首先让张劲夫表态。因为造反派坚决反对他检讨，所以称表态。然后是应地所两派代表发言，分别是王锡鹏和吴智诚。再后面是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的两派代表发言。造反派皆说张劲夫的表态不诚恳，保守派皆说很诚恳。王锡鹏讲得还可以，说明他有一定能力。吴智诚已不被当时群众看好，一上台即引起哄笑。自动化所代表造反派发言的是1965级研究生陈小虹，后来他成为院革委会委员。

9月7日继续开会。只有四人发言：大气所和物理所的两派代表。物理所代表造反派的是1965级研究生常龙存，后来他成为物理所革委会主任。他们讲过后，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临时要求讲话，他最后喊了打倒张劲夫的口号。

大会进行期间，周恩来出去接过一个电话，处理到海拉尔串联红卫兵在中苏之间的国际列车上造反的事。

也许本来还安排了发言，但是周恩来临时决定作了最后讲话。他的讲话要点有这些：1. 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对目前情况不满。2. 对这个大会不满，实际中止了大会，要求各所分别开会辩论张劲夫的表态。3. 说科学院的情况很复杂，要是罢官能解决问题，早罢了。4. 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不满，要求他们不要再参加这边的运动，也要求科技大学的学生回校参加运动。

造反派对周恩来的讲话感到不满，因为没支持造反派，也因为让科技大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人离开。但是造反派也就是腹诽而已，没人敢公开反对。

接下来就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把辩论会降了一级，在各所分别开，由各所属单位（研究室等）两派代表分别发言辩论。另调查统计每人对院党委和张劲夫的态度，有多项选择，例如可以打倒张劲夫，也可以建议停职。统计结果未向群众

公布。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回去了，没有再来。他们从此和这边分家，直到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后来他们那边文革闹得更厉害，和他们分家应是明智之举。科技大学“革命造反派”宣布解散，以后也基本未介入科学院的运动。

各所里开完辩论会后，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没什么事干了，于是恢复业务工作，运动陷入低潮。

但是周恩来继续过问科学院运动。他经常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院里两派代表开会，并作一些指示，由代表们回来口头传达。他当时对两派持均衡对待的立场，实际有利于造反派。例如他批评院里只给保守派铅印传单，称为“铅印传单事件”。

他还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人家庭出身好是一个好，表现好是另一个好。赫鲁晓夫出身好，表现不好，而他周恩来自己出身不好，但表现好。这话听起来有些问题：难道赫鲁晓夫和周恩来能等量齐观吗？还有一次他谈到历史上的“查三代”，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对这些讲话，造反派都不很满意。

但是他也说过，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这些话，造反派爱听。

当时对“查三代”等问题敏感，因为当时正处于“红八月”以后。“红八月”中的“破四旧”在中关村地区影响不大，抄家打人事少于城内。有周围的中学红卫兵来此滋事，实施暴力行为。血统论也影响不大，造反派组织成员的家庭出身比不过保守派，但其中“黑五类”也很少。少数有问题者，迫于血统论压力，叫他们悄悄退出了。科学院也成立了专收“红五类”的红卫兵，倾向造反派，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没起什么作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追查整群众的“黑材料”，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第一件事，是解散了各所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这些劳改队多成立于6月，收容了揪出的各类“牛鬼蛇神”分子，但是被批判的造反派一般不在其内，所以在“五十天”被否定后没有立即解散。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感到这些人也没什么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是运动重点，所以都给解散了。这些人的问题也没人过问，直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重提，劳改队再次成立。

第二件事，是造反派整理队伍重振旗鼓。原来的全院造反派队伍称“革命造反宣传团”，为一个松散的联盟，现在改称“革命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各所的组成队伍均称大队，如天文台的东风大队、数学所的火炬大队、物理所的革

命造反大队、力学所的红军大队等。各大队由若干战斗组组成。

第三件事是召开各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这些基层的会议，已不是辩论会，也不是批斗会，一般对事不对人。例如在研究室一级，在会上先由支部书记代表支部检讨，然后大家发言批判。在院一级，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张劲夫，保守派就批判院第二把手裴丽生。到了10月下旬，院党委公开为应地所、化冶所事件平反。

1966年11月5日，造反派到院部抢“黑材料”，张劲夫交出了作为中央文件的两位副总理关于应地所事件的讲话。这个讲话，6月24日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在公开场合念过，所以也不算什么机密文件。11月6日，院“造反团”派人到李富春办公室询问此事，后来得到李富春办公室一信，说所谓中央文件完全是张劲夫一手编制和伪造的。于是“造反团”及下属组织连夜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罢张劲夫的官和改组院党委。11月7日凌晨时分，周恩来联络员找“造反团”开紧急会议，说李富春办公室的信必须收回。联络员还对“造反团”说，张劲夫为什么把这个材料给你们？于是这天下午，“造反团”采取非常行动，到院部把党委一些材料封了。王锡鹏则封了院保卫部长宫震的办公室。

造反派此时明白，两个副总理的指示当然确有其事。看到中央文件的造反派也没有泄露其内容，所以至今人们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也不难猜。造反派也明白，不管此事真假，周恩来的意思是别把火烧到两位副总理头上，而叫张劲夫承担全部责任。道义上对不对无人考虑。

这以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抄出的“黑材料”暴露了许多“反击”期间的内幕。在几个所里揭发出在1966年7月曾执行过一项极其机密、“单线联系”的中央交办“西公”专案（详见拙文《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载《记忆》2009年5月20日第13期，总第23期）。这个专案的内容就是要在1966年国庆前，把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予以处理。这些政治不可靠人员被划分为五类，其中最不可靠的要分别送往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地。一些所里被打为“反党分子”的人员其实就是这个“西公”的候补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也有文革初期反对党委的人。后来很著名的科学家、曾任科技大学校长的管惟炎也被打成二类“反党分子”。由于这些“反党分子”名单涉及人员太多，激起了几乎所有人的愤怒。

还有些“黑材料”是文革初期院保卫部派遣一些“特情人员”以伪装身份到基层接近造反派群众探听的消息。看到领导以此种对待敌人的手段对付群众，也使群众思想迅速左转。

这时已是12月，借口和北京林学院炮打中央文革的李洪山有联系，“造反团”揪斗了保守派“串联队”头头，各保守派组织均被捣毁。中间群众转向，造反派

队伍空前扩大，连一些“摘帽右派”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文革主导思想被大多数群众接受，造反情绪激昂。陈春先（后来成为“中关村第一人”的著名科学家）当时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造反派内部的分歧

从造反派组织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保守派上（是否应该和他们一起开会等）。

1966年10月后，一些造反派，特别是其中善于思考的那部分人，开始从社会角度认识文革。就是说，不能把根源仅仅推到刘少奇这几个领导人的身上，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来看，总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探索如何改革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时候，从高校转抄来的一些文章，如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等，为很多造反派熟读。地院的学生则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后来又改成“一切权力归左派”。北航一些造反派理论家则说，在新的形势面前，造反派必然分裂。

在这些思潮冲击下，科学院一些造反派嫌“造反团”“右倾”，就在11月初，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极左派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后来简称“全红”），由王锡鹏、陈小虹和科仪厂的史铁柱等签署成立宣言，自动化所的造反派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刚一成立，他们就模仿红卫兵，发布了一个《第一号通令》，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左派”。他们还坚持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个组织为什么称“全国”呢？因为科学院还有很多京外单位，这时也纷纷串联来京，这个组织希望和“造反团”划分活动范围，也为了在名义上不和“造反团”形成分裂局面。

王锡鹏被平反以后，有点像刚平反时的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了，可也不被“造反团”待见。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他参与了“全红”的组建。但是后来可能由于意见分歧，也可能“造反团”拉了他一把，很快退出“全红”，变成“造反团”领导之一了。

11月25日，在物理所开辩论会，分别请“全红”和“造反团”两方面的人解释他们的立场。“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会上辩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口号来源于十月革命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这样的口号是否适用现在拿不准，造反派也一样，也有部分造反派对这口号竭力攻击。至于保守派是被批判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很多激进的造反派都这样看，但是不说，因为觉得太伤人。总之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促使了造反派的分裂。

至于现实问题，有点类似清华大学在8月份的八八、八九派之争。比较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那么激进的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批判张劲夫。

由于这个“全红”太激进，也可能有其他内部问题，许多创始者后来都相继退出，成为一个人数很少、没有影响力的小组织。只在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占优势。后来由于内部争斗，又分裂出另一个“红色总部”，简称“红总”，就更没影响力了。

12月27日，另一群众组织“红旗联络站”（后来简称“红联”）在自动化所成立，有数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力学所、电子所等十来个单位的造反派组成，靠领导人的号召力，在一些单位里有群众基础。他们自称是“造反团”里的一派，基本上持比较左的立场，但具体观点也不尽一致，未能提出明显区别于“造反团”的鲜明政治主张。有少数单位的保守派因对“造反团”不满，也参与其中。

“红联”一成立，就在1967年1月干了一件露脸的事，从院部抢来一个文件保险柜，放在物理所，目的还是想整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材料。他们觉得不但应地所事件，文革以前科学院的一些问题也应与二位副总理有关。

夺权和内战

1967年1月，全国各处开始夺权。科学院造反派也在讨论如何夺权的问题。夺权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周恩来已宣布，科学院领导人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问题是夺权后的组织，是以造反派群众组织出面，还是各所派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各所出代表。

正在讨论之际，1月21日晚上，“红联”和“全红”抢先夺了权，引起了一番内战。

这次夺权，称为“一·二一事件”，不是“红联”领导事先策划的结果，而是在群众讨论会上临时决定的。这一天，“红联”组织群众在物理所的阶梯教室里就夺权问题讨论了一天，晚饭后继续讨论。一些激进群众说我们必须现在就去夺权，否则就是右倾了。在他们煽动下，“红联”领导人也同意了。碰巧“全红”领导人邱海平在场，也表示支持和参加。于是群众一哄而起，徒步涌到院部夺了权——也就是夺了几个印章。这事说明，文革中的所谓大民主，至少当时所理解的大民主，是很荒唐的。

这种单方面行动当然引起“造反团”方面强烈反应，立刻对“红联”进行讨

伐，而且在1月23日再次进行夺权，成立了临时性权力机构“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1月23日这一天，“红联”派很多人到院部企图阻止“造反团”的夺权。两派群众发生冲突，也就是肢体碰撞而已。在科学院的文革中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武斗。

1月25日，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又开大会。周恩来总理讲了话，王锡鹏和张本也发了言。周恩来讲话没涉及科学院夺权的具体问题，只强调要联合，强调大方向一致，反对分裂主义、山头主义，要互相尊重。但是2月4日传达了她的简短指示：科学院已夺了权，要进一步大联合，原科学院印章作废，新给“联合夺权委员会”刻章，马上组织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抓生产。

总理的指示肯定了“造反团”的夺权，也给“红联”一个台阶下。根据他的指示，“红联”占优势的各所也派遣了代表参加了夺权委员会。

但是“造反团”继续攻击“红联”（当时社会上各部门和单位都因为夺权问题爆发内战）。他们借用清华团派攻击四派的说法，说“红联”是“托派”。2月14日，他们发了一个通令，叫“红联”把1月初从院部抢来的保险柜送回，继而在下午组织大批人员围攻物理所。也发生了肢体冲突（不是武斗。科学院的人也就是这个水平，谁都下不去手）。5月8日，“红联”在灯光球场开会予以反击。

从院部抢保险柜这件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大队人马冲击物理所这样的“机要单位”也是很不妥当的。从这件事后，双方的斗争也就逐渐平息了。当然在“联合夺权委员会”内仍有暗斗。

“联合夺权委员会”选用原西郊办公室的平房小院（简称西办小院）为办公场所，而没有进驻位于友谊宾馆北馆的院部，以示和“旧政权”决裂。他们从各所抽调了一些兼职的办公人员。这是科学院领导机构最精简的时期，好在也没有多少事可办。

名义上“联夺”召集的各所代表会是院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各所造反派派遣的人往往不定，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行前去参加。会场好像十月革命时期的斯莫尔尼宫，也像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七嘴八舌，乱哄哄的。你坐在那里也没人问你是谁，没人管你，因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在会上发言，就有人打听你是哪个所的。

成立革委会

随后开始酝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结合哪些领导干部。原来的院党委都被打倒，争论的焦点是结合总理联络员刘西尧问题。“红联”认为刘

西尧处理科学院两派问题不公，在保险柜等问题上偏袒“造反团”，因而反对结合。刘西尧原来是二机部副部长，由于文革初期在二机部执行“反动路线”的事情还没完，当时没有在科学院结合，但是后来还是被结合了。

刘西尧结合不成，5月14日，院“联夺”写信给陈伯达，要求他出任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又连续三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此任命。但是陈伯达已是科学院副院长，越过郭沫若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周恩来想找个能压得住阵的来当首席军代表，就选了粟裕。

1967年7月30日，就是1966年两科大会一周年的日期，科学院在人大大会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聂荣臻、郭沫若、肖华、粟裕、吴德、周景芳、聂元梓、张本等出席。后来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等也来了。会议由“造反团”周信主持，“红联”邹协成致开幕词，“造反团”王锡鹏作总结。郭沫若当场作诗，周恩来、粟裕、吴德、张本等讲了话。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成员有王锡鹏、张魁三、萧剑秋、柳忠阳、李先惠、刘继新、乔林、周信、刘继英、邹协成、戴銮谟。（《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国科学院网站》）其中张魁三、萧剑秋是领导干部。其余皆是群众代表。粟裕虽是首席军代表，但是这次大会以后，他再也没有在科学院露面。由于郭沫若是虚的，结合的领导干部也不很强，实际权力落在“造反团”的造反派手中。主要掌权的是原来院团委的干部柳忠阳。

周恩来在这个会上讲到，夺权后产生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你们要承认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现在科学院的造反派中大体分来可以说有两派，一个多数一个少数，这肯定是多数少数是个一时的现象，名称刚才我得到，你们原来叫‘三红’现在叫‘六红’，你们就拿这个七月二十九号作为一个日子，正在积极筹建七二九总部。”他说这是“一件可喜的现象”。

他说的“六红”，是哪些“红”，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除去“红联”、“全红”以外，肯定都是些没影响力的小组织。他说的“七二九”也名不见经传，根本没组织起来。他的意思是小组织别太多，反对“小团体主义”，而形成两大派是正常现象，甚至应该鼓励。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因无“反”可造，大多数造反派基层组织已不经常活动，甚至名存实亡。现在听了周的讲话，又有所恢复，由于人员的重新排队，成立了许多新的战斗组。但是成立以后，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已基本过去。

这之后，各所也纷纷以选举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了领导干部。但是在很多所里，仍然是造反派掌权。

革委会以后一年

1967年9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后，根据上级布置，科学院开始抓“五一六”。

因为科学院是归周恩来管的，院外群众组织一般不干涉这里的运动。院内的造反派也不跟社会上的组织有固定的联系，当然对其他地区、部门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1967年春，四川“二月镇反”被否定以后，四川大学“八二六”派领袖江海云曾来院做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两派都派人到四川支援那里的造反派。

至于北京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红卫兵团”从未派人来科学院，这里也无人与他们联系，当然不可能抓出什么“五一六”分子来。“造反团”一些人很想乘这个机会整一下“红联”，但无从下手。况且这次运动要求各个群众组织各自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没闹出大的声势来。

但是他们在“四不要”礼堂（注：这个礼堂修建于大跃进时期，当时宣称没有使用四种建筑材料，故有此名，但具体是不要哪四种建筑材料，已经无人说得清楚了）开了个会，批判“全红”的领导、651设计院的邱海平。邱海平曾用很委婉的方式称赞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说他们的观点很难驳倒。（伊林·涤西回忆曾在科学院做过报告）所以现在有了批判的借口。

这个抓“五一六”的运动没什么结果，到了1967年底就结束了。到了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有批判右倾的趋势，局势又有一些动荡。国家科委的造反派头头张本被逮捕，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少数造反派又活跃起来，两派的都有。这次批判的是院党委的“第二套班子”——就是说，在院党委快垮台的时候，院监委一些干部也参加批判院党委，现在怀疑他们是院党委预先安排的“第二套班子”。这个活动当然也没什么结果。

从1967年9月起，科学院新技术局各单位进驻了军代表。他们一般支持造反派，但不涉及造反派内部斗争。他们倡导“斗私批修”，以及一整套“早祝晚颂”的仪式。当然非新技术局各单位也很快学了这一套。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力图恢复文革前的概念，认为派性是由“私”字引起的，是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实际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政治学习那一套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过文革的“洗礼”，群众对此不很信，只在表面应付。

1967年聂荣臻提出一个大国防科委概念，并开始着手组织18个研究院。根据毛泽东10月25日一个指示，科学院新技术局各所要并入国防科委各院。后来一部分所并入了，一部分所又退回科学院。还有一些单位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国防科委和保留在科学院。这使得中关村这块本属科学院的地盘变得四分五裂。

在此期间，科学院新技术局的造反派也曾介入国防科研口的运动，如参加5

月4日在北航召开的“彻底批判国防科委某些负责人的山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誓师大会”。这些头衔都是国防科研口造反派乘“三二四”之机给聂荣臻扣的帽子。因为垮台的杨成武是“华北山头”的，涉及聂荣臻，所以他设想的18个研究院计划也没有完全实现。

朝鲜族人员逃离事件

在当时的我国，朝鲜族可能是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文革前，中关村地区的高校、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朝鲜族所占比例远超过这个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数目也可能超过回族。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廖承志在北大的一个国际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朝鲜也“变修”了，虽然没点名。他说：“对某一个角落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坛坛罐罐多了，怕打破坛坛罐罐，因此就怕革命，看见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就吓破了胆，跑到莫斯科的怀抱里去了。”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说两国在鸭绿江两岸安装大喇叭相互攻击。

1967年下半年，朝鲜开始通过驻华使馆到中关村地区挖人，组织朝鲜族的科学院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逃往朝鲜，当然给予他们若干许诺。

要是在文革前，这种逃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控制得严，也因为当时大家认为还有前途。但是文革开展一年多，对时局都很失望，特别是1968年以来，举行什么“早祝晚颂”那一套，按一位朝鲜族朋友私下所言，跟宗教仪式差不多，也使多年来培养的信仰坍塌。

1968年上半年，这种逃离活动达到高潮，有总数大约几十人参加。他们按照朝鲜使馆一位李先生的安排，从我国东北地区一条秘密途径前往。他们都是携妻带子，可能还带了一些家当，所以不可能十分隐秘，于是大部分人被抓回。当时处理尚比较宽松，只在单位内隔离审查。科学院的都关在院里审问。其中党员都被处理，但是文革后平反了。至于成功逃到朝鲜的，据说都很后悔，还有些被遣返回国。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7月3日，科学院革委会宣布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但是在北京，这一运动从1968年春季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运动的轨迹是先历史后现行。历史问题，例如什么“漏网右派”问题，都提了出来，对有历史问题的人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劳改队也重新成立起来，收容一些有问题的人。

从两派打内战、选举革委会、军代表进驻、开展斗私批修，以及 1967 年夏开始的修建毛主席塑像运动，人们对那些很激进的造反派开始失望。这些激进造反派也不适应这样的新形势，因而革委会虽然仍由造反派掌权，但是多是那些比较正统、稳重的造反派被选举到领导岗位。清理阶级队伍的前半期，是在这些造反派掌权时期进行的。所以这些掌权的造反派也应对这个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负一定的责任。

1968 年 8 月，近年来毕业分配至科学院的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下放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其中包括很多文革活跃分子。

1968 年 9 月 20 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及所属各所，全面接管权力。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改造者自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造声势，形成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他们把主要矛头对着已不掌权的激进造反派。

1969 年，经周恩来批准，已经下放到解放军农场的两位原“红联”的骨干成员被揪回北京接受审查。其中一位是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名义上的罪名是反江青，其实也就是私下说江青几句坏话。这之前，在 1968 年 12 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讲话中已经点了徐鲁溪的名，说她“反动得很”。由于受到这个徐鲁溪的牵连，在批判“二月逆流”时，“红联”这些人也受到批判。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另一严重受迫害群体是高级知识分子，即科学家。此时我们必须提到科学院的京外单位。当时科学院在京外各地分布着几十个研究所，分属几个分院领导。在文革初期，它们的文革均纳入各地文革进程，实际与科学院院部及在北京的单位关系不大，所以没必要在本文叙述。在这些京外单位中，以刚从北京搬去的贵阳地化所在贵州造反、夺权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因为京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晚于北京，到这个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所以和北京不同，这个运动从开始就在军宣队领导下进行。在这些京外单位中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远比北京激烈，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其中最恶劣的是东北和上海。

在东北，以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和大连化学物理所最为突出。这两个所都是科学院的骨干研究所，为我国科学事业贡献甚巨。当时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光机所变成迫害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单奎章在该所大力推行极左路线，说光机所是“特务窝”，他为所欲为，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令人发指，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有 300 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 多人被隔离审查，5 人被送公安机关，13 人被逼自杀。

由于中共执政前就参加工作的科学家这时分布全国各地。这些研究所整出来

的“特务线”必然牵动全国各个科研单位和高校，于是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全都遭劫。如管惟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物理所所长、磁学家施汝为：“后来发现从别的单位传出来说他也是特务，全国所有像他从国民党留下来的全都是特务，一个咬一个越咬越多，……”（《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在科学院的京区单位，有物理学家张宗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

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 9279 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 881 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 102 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 180 名中，被立案审查的 107 名，其中 83 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 6% 的生活费。

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没有公布，但肯定是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清理阶级队伍是科学院文革中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

批判相对论

文革中的批判相对论有官方和民间两方面。这种批判由来已久，认识根源是从直观感觉无法理解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从而怀疑这些理论不对，总企图用经典概念解释。

1967 年下半年，北航“红旗”到湖南醴陵串联的学生在当地发现一位中学物理教师周友华在批判相对论，就把他带到北京活动。这个周友华，除去不赞成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外，还观察了一个单摆运动的季节变化，并得到结论，说温度影响重力，温度越高，物体重量越轻。这个结论，他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物质形态间总是相互作用。别人告诉他，这只不过是冷缩热胀造成的，他不信。

周友华到京后，去科学院物理所活动。物理所革委会派一位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年青人帮他理清思路。他却很不理会这个帮助者的意见，说他是反动权威。这反映了批判相对论的社会基础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贬低科学家的宣传。

1968 年 2 月，在物理所召开辩论会。周友华首先讲述了他的理论，然后自由发言。其中绝大多数发言者都首先表示，周友华想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科学研究中去很好，值得鼓励，然后说从科学观点他的理论不对。只有一位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表示同意周友华对相对论的批判。最后，院革委会委员、自动化所的陈小虹表示支持周的批判。后来物理所又组织了一次辩论会，但是周友华没有参加。在这第二次会上，所有发言者均表示不赞成周友华，陈小虹也宣布撤回了上次的支持。

但是事情没有完，科学院内一些人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批判小组。参加者的

动机是复杂的。他们对相对论的认识当然没有周友华那样肤浅。在学术意义上，相对论也不是不可批判的。由于文革中所有理论研究均遭批判，被说成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无事可干，这一来有了借口。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后来对台湾《物理》杂志说，他其实是反对批判相对论的，参加这个批判组是到里面当“内应”。

这个小组一方面学习有关知识，一方面写批判文章。1968年7月5日，科学院革委会向毛泽东、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称，最近组织了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他们的活动终于在1969年秋得到上面的支持。支持源于毛泽东（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问相对论能不能批判。陈伯达询问了几位科学家，回答各异。这也许鼓舞了陈伯达，他遂布置科学院关注这一批判。毛过问批判相对论一事，刘西尧在1971年也曾透露过，可作为佐证。（郝柏林《负载吟啸录》，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

1969年10月23日，科学院革委会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开会讨论这个批判组写的批判文章《相对论批判》。打算讨论通过以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会议由院军代表郝梦笔主持。何祚庥第一个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批判相对论。然后周培源发言，表现出一些保留态度。其他一些科学家也纷纷发言，与其说是支持相对论，反对批判，不如说是含糊其辞，虚与委蛇。他们都说相对论应该批判，但是都不明确支持批判小组的这篇文章。所以最后军代表总结时只能说，再努把力，写出两三篇更好的文章来。实际上否定了这篇批判文章，当然也未能在《红旗》上发表。这次会后，科学院批判相对论的活动逐渐沉寂。陈伯达又去北大兜售这一批判。科学院这个批判小组逐渐转入理论物理的研究，文革后大部分成员进入新成立的理论物理所。

1970年3月，陈伯达又在首都钢铁公司组织了一次“炼钢自动化”攻关。由于钢铁学院、钢铁研究院这些单位都已下放到外地，他主要从科学院找人参加。当时有自动化所、力学所、物理所等几个所几十位人员参加，生物物理所的专家贝时璋也去过一次。由于这些人对炼钢都是外行，干了几个月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随陈伯达在政治上失势，这一活动就结束了。但是很多技术人员从此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伯达把“青年人比老年人强”的思想发展到极致，在首钢多次说要请中学生来参加攻关。按照这一思路，科学院还制订了要面向中小学的发展方向。

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

这个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在 1970 年 3 月，但是在科学院，从 1969 年底就开始舆论准备，1970 年 1 月正式开展。当时工宣队已经撤离，运动主要在各级军代表主持下进行。这个运动和当时的“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当然也抓了其他类型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以抓“五一六”为主。

因为“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反周恩来的，所以这次运动主要清查反对周恩来事件。如果没有反对周恩来的，就清查反对总理联络员的。所以主要矛头对着比较激进的造反派，即“红联”一派。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很多造反派不满，但是公开反对的基本没有，只是在私下有些议论，如认为总理“婆婆妈妈的”，说话不像中央文革那些人那样痛快。可是到了 1966 年底，周恩来宣布张劲夫等是个“反党集团”，超过了造反派的口径，造反派就感觉原来错怪了周总理，还是总理想得周到，如果一开始就宣布打倒，会像北大一样，阵线不再分明。所以那以后，就无人埋怨周恩来了。至于反对总理联络员刘西尧，是另一回事。

现在这些成了罪过。物理所的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给这些人定性说：“有些人议论总理”，说得非常恰当，但是“议论”一词该怎么理解？在当时“议论”就成了个大罪名。

对被审查人员办学习班，其中一些人被不同等级地隔离，开批判会，制造恐怖气氛。在压力下，一些人承认参加了这个“五一六”反动集团，并交代了同伙。于是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总共抓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远超过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数，因而成为科学院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

1970 年 11 月 14 日，科学院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全院大会，由物理所、化学所两个“红联”小头头交代他们参加“五一六”的问题，并且从他们的口揭发，“红联”的各级组织就是“五一六”的各级组织，“红联”的各级头头就是“五一六”的各级头头。他们交代后，就立即被宣布“坦白从宽”，当场释放。还有一个“抗拒从严”的，被当场逮捕。这种把整个一派群众组织打成“五一六”组织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少见的。

这当然造成大面积冤案。一些专案组成员今天还在审查别人，明天自己也变成被审查者。“红联”的头头当然受到更严厉的逼供。原“红联”主要领导人、曾任革委会常委的数学所的邹协成，在拘禁期间被迫跳楼自杀身亡。

这些被审查者的胡乱供词当然无法合理衔接。如此多的“五一六”分子，头脑正常的人也不会相信。汇报到中央，负责这次运动的吴德、谢富治等人也很困惑。但是周恩来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宣布要“重罪行”：以前说你是“五一六”，现在也没说你不是，只是不跟你计较这个，只从你的“罪行”定罪。至于什么是“罪行”，比“组织”来说，更容易构织。

实际上，在这个运动中所批判的所谓“罪行”，除去反周总理，还有“反三红”，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反革委会，在两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全都揭发批判过，也处理过，没有什么新的材料。

这个运动到了 1971 年“九一三”以后就逐渐沉寂了，但是被审查人员在几年里长期得不到解放。最坏的是，把很多人“内定”为敌我矛盾，但不告诉本人。例如到了 1973 年，一位干部被派往高能物理所，发现“有相当一批技术骨干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有政治问题，有 20 余人被内定为敌我矛盾。”（《崔培荣》，[百度百科](#)）这些人数之多已经到了难以开展业务工作的地步。后来这 20 多人被解脱了。很多人一直到 1975 年胡耀邦等人来科学院后才得以解决，但是始终没有被正式平反。

这个运动主要对着“红联”一派。作为院领导之一的造反派王锡鹏不属于这一派，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把柄可整。但是，在科学院计划座谈会期间的 1971 年 3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全体会议人员时说：“那一年 7 月 30 日大会是怎样开起来的，你们搞清楚没有？科技大会推荐了两个造反派，一个张本，一个王锡鹏。他们受到陈伯达的表扬，王、关、戚的推荐。开这个大会，我们都不晓得。”于是借口和陈伯达有关系将王锡鹏解职审查，后来居然也将其打成“五一六分子”。此后，居于领导位置的造反派只剩柳忠阳等极少数人了。

王锡鹏担任院领导职务后做过一些工作，如处理科技大学外迁事。他未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也未表现揽权，在两派斗争中立场比较超脱。他是科学院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1966 年 7 月 30 日大会是科学院造反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对两者的否定，意味着对初期造反运动的否定。

对外开放

1972 年初，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成为开始对外开放的信号。因为科学离政治最远，所以科学院走在前头。首先是外国科学家来访。1972 年 2 月，瑞典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来访。这次来访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的，但拖到此时才得以实施。在对美交流方面，是华人科学家打了头阵。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早在 1971 年夏就第一次访华（后在 1973 年被毛泽东接见）。1972 年 7 月，以任之恭、林家翘为首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保钓代表来华。7 月 14 日周恩来接见他们，并当场宣布了林彪事件。

1972 年 10 月 6 日，科学院派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出国访问的科学家代表团，以贝时璋为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对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访问。代表团 12 月 16 日回国后，曾向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但是核心小组为了避

免引起“思想紊乱”，决定不向科学界传达。这个科学院的核心小组是1972年7月成立的，郭沫若为组长，刘西尧、武衡、王建中为副组长。

1972年8月18日，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意见和希望。9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支持。1973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科学院派张文裕率团到美国和日内瓦欧洲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参观访问，考察高能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设。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的报告。此后由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加速器预研被迫停顿。

1974年，科学院开始向外派遣公费的“访问学者”，主要是到西欧各国工作一段时期，一般为期两年。这样一批学者归国后，一般成为研究骨干。

此时已有一些政治条件好的研究人员外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封闭了多少年以后，走出国门所见所闻带来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国外一些事物，如超级市场，以前闻所未闻。但是他们回来后又不敢如实叙述，最典型的说法是外国“不是想象（或传说）那样好”。

在这段时期，旅美华人科学家对我国科学事业帮助很大。1971年，在美华人华侨掀起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许多华人科学家成为运动骨干。他们大多出身台湾，但在运动中思想迅速倾向大陆。1972年后，他们中很多人相继访华，以各种形式与大陆科学家合作研究。也有一些人从1973年开始回大陆定居，主要安排在科学院工作。但是鉴于当时国家外交政策，他们的保钓宣传没有受到积极支持。

1972年7月，美国一所普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牛满江访华。1973年后，在科学院的支持下，他多次回国与科学院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合作研究细胞发育遗传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科学》发表后，从1974年就受到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科学家的质疑，后来外国同行也不认可。但是从政治上考虑，1975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动物所制定了细致的对牛满江的接待计划。

“重点之一是做好对其有质疑的群众的工作，宣传牛满江此次来访在更好地配合对外斗争和对台工作，以及扩大我国政治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他有伪造试验数据、利用行政力量打压不同意见者这些劣迹，但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然一直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直到2006年，《南方周末》发表揭发此案的文章后，还被迫另外发表一篇赞颂牛满江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对发表前一文做了检讨。

批林批孔运动前后

1974年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科学院发生这样一件事：1973

年夏，科学院开始筹建感光化学研究所。由于进展缓慢，一些筹备处人员乘批林批孔运动之机，于1974年3月7日给江青写了封信，声称院里主持该工作的武衡应对此负责，科学院出现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妖风。由于这个所涉及电影胶片，江青当然很关心。她于3月10日回信说：“我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即学习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3月12日，她又向感光研究室送一篇署名文章《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把江青的信连同署名文章印发全院人手一份，号召向院内“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猛烈开火，还召开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不积极开展批林批孔、压制新生力量，以及“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复辟回潮”的事例。

此时在院里主持工作的是核心小组副组长周荣鑫。他是1972年应郭沫若的要求调来科学院的。他在科学院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还是很主动的，似乎和后来他调至教育部后的作为有差别。

科学院的批林批孔运动主要应批判武衡。但是武衡在这一时期正生病住院。等到他出院以后也没怎么挨批，因为“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核心小组成员之间矛盾激化，闹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批判他了。（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江青对科学院印象不好，可能与陈景润事件有关。1973年3月，江青从一份内参中看到关于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数学难题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身体很不好的报道，经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救活陈景润”后，派遣迟群会同武衡、协和医院的张效骞等于3月25日到陈景润住处（即中关村88楼）看望，将他送去体检后住进309医院。陈景润的论文也在英文版的《中国科学》上发表。实际上，当时陈景润身体固然不好，还没坏到要“救活”的地步。他当时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后来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有许多煽情的描写都是夸大其词。他就是性格内向一点，这在科学院也不罕见。

到了1975年，科学院又发生一件事。当时毛泽东要看科学院所属单位主办的《化石》和《动物学报》，要求专门给他排印大字本。这项要求使得两杂志编辑们兴奋不已。科普杂志《化石》的编辑张锋乘势在9月6日向毛泽东寄出一封信，诉说想把刊期从半年提高到季刊所遇到的困难，并把问题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9月16日，毛泽东对来信作出批示，说是“一封诉苦的信”。此时胡耀邦等已经来到科学院。他们不敢怠慢，赶紧召开全院大会落实，将有关人员批了一顿，对有关具体问题作了处理。

这几件事说明，在当时，上上下下无论什么人，都把“路线斗争”当作攻无不克的咒语，当作争取自己利益的工具。

此外，王洪文在担任党的领导人以后，也曾过问过科学院的业务工作。他曾

多次来院视察卫星工作，还曾接见物理学家李荫远，询问研究碘酸锂晶体事。

胡耀邦“百日维新”

1975年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科学院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华清参加党组主管业务，王屏参加党组主管政治工作。后来胡克实也调来，科学院再次成为藏龙卧虎的地方。7月18日胡耀邦等到任后，马上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于8月11日起草完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经修改后，于8月17日以胡、李、王三人名义上报，后经胡乔木主持修改后改称《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于9月28日报送中央、国务院。因毛泽东提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不是他的话而没能下发。（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回首文革》）

武衡认为“这个汇报提纲看起来紧紧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面地论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方针，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似乎谁也感觉不到什么不同的意见。汇报提纲对当时科学技术事业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对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只字未提。”

所谓“四平八稳”，说的是该文件全文结构都是这样的：先说一方面应该如此，再说另一方面也应该如此，等等，所以后来被批判为“二元主义”。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防止挨批，“四平八稳”是难于避免的。胡耀邦、李昌之所以挨批，问题可能主要还不在于这一文件，而和他们到科学院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有关。所以在他们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要他们少讲话，可能已经听到了一些反映。

他们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对待科学技术、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认识和政策。例如他们批判“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是对着“四人帮”来的。就意识形态来说确实如此。但是除去有关江青的几件事以外，“四人帮”对科学院的直接影响不大。他们所批判的极左思潮也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专利，而是从文革前就泛滥在知识界的陈词滥调，所以他们深受科学院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和毛泽东的“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相抵触，所以不能为毛泽东接受。

胡耀邦等人空降到科学院类似于派工作组，所以事情的发展也显现出工作组模式的问题，就是往往过于否定原有的干部和原有的工作成绩，未能尽量团结原有干部共同进行改革。他们以大刀阔斧的姿态推行改革，有强烈的号召力，但急于求成，进驻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总结性的文件（这也是中央对他们提出的要

求)。按管惟炎的说法，胡耀邦“太容易冲动了”。所以这一“百日维新”和历史上海康梁所为有共同缺点，应为以后所有改革家鉴。他们这种单打独斗遭到挫折后，也使权力出现真空，为柳忠阳这种小人所篡夺。

胡耀邦在科学院办的一件实事是关心研究人员的生活，即所谓“五子登科”。具体事例是开始建筑一批住房，但进展极为缓慢，直到1984年才落成。那年笔者从俗称“鸡窝”的平房宿舍搬进这批楼房。作曲家王立平曾到这一“鸡窝”访友，惊诧于研究人员居住条件之恶劣，用自带相机拍摄数幅照片，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上展出。当时我们谁家也没有相机。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控告迟群信的批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清华大学的问题。胡耀邦、李昌也参加了会议，并事先通知他们做检查。当天晚上，王洪文和胡耀邦谈话，指责他说过的一些话。（唐非《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2005）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提出了“右倾翻案风”问题，从此在全国开展了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小平主持下的整顿中断。作为批判对象的是“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李昌被停职检查。

1975年12月，柳忠阳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胡耀邦等人的问题。毛对两封信的批示，一次是“印发政治局，予以调查研究”，一次是“印发政治局”。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许多地方被压制的造反派想乘机翻案，十年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苦主也不断上访。但是科学院没有这样的事。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制造冤案打击造反派的主要是军代表，柳忠阳等人也有份。由于以后几年科学院的领导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后来的领导干部对这些运动没有责任，所以被打击的造反派都是在周荣鑫、武衡、胡耀邦等人在任时获得解放的。他们认为柳忠阳这些原来的造反派右翼早已变成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所以主要反对的是这些人。他们对外来的军代表并无很大意见，身为知识分子，当然和其他群众一样，也非常拥护胡耀邦。所以在这一时期，科学院几乎所有群众的政见都非常一致，柳忠阳等沦为毫无群众基础的一小撮投机分子。

1976年2月7日，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因科学院是当时批判重点单位之一，宣传部门特别重视，派遣许多记者前来采访，

并计划在电视上报道。这天胡耀邦请假未来。李昌虽已遭受批判，但并未撤职，名义上仍为科学院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开始后，有群众递条子，说好久没开全院大会了，大家都不认识诸位现任院领导，希望能现场介绍一下。于是会议主席让各位领导逐一站起来介绍。当李昌站起来的时候，全场人员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等柳忠阳等人站起来的时候，嘘声四起。介绍完毕，进入批判发言正题，群众纷纷借口上厕所逃离会场。主持者见状忙找人在大门口堵截，严令不许离开。于是人们都拥挤在走廊上闲聊，会场里听众稀稀拉拉，不成体统。会议草草结束，电视报道也泡汤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科学院当时的人心所向，也说明，经过十年文革的折腾，群众有了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政见的安全方式。

这一事件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在科学院的预演，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院的人参加“四五”事件那么积极。

“天安门事件”和文革结束

后来就是“天安门事件”或称“四五”运动了。据说，参加“四五”运动最积极的，第一是七机部，第二是科学院。其实七机部一些单位也是从科学院分过去的。例如自动化所分到七机部一个 502 所。“天安门事件”后，两所的人共同编辑《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科学院最出风头的是 109 厂（即后来的微电子中心）。他们制作了四幅写有“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大标语送到天安门广场、竖在纪念碑周围。

参加这一事件的群体分析缺乏数据，因为当时没有人敢出头。我听计算所一人说，其实积极参与的人都是原来“反总理”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反总理”的人变得拥护总理，认为他们“别有用心”。这说明一种现象：运动初期被说成“极左”的造反派现在持“右”的立场，而原造反派右翼柳忠阳等成为拥护“四人帮”的极左派。

“天安门事件”很快被宣布为反革命性质，109 厂有三位诗作者被捕，17 人隔离审查和停职，30 人被勒令交待，重点审查对象 70 人。计算所、半导体所等单位还有十多人遭到拘留。

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柳忠阳等自以为得计。4 月 21 日，他们以院党组的名义签发《关于胡耀邦、李昌反对和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言行的报告》，其中还批判了武衡，送至中央办公厅，“受到呵斥，被退回科学院。”

原来，分工负责科学院的中央领导人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科学院时直接向他们布置任务的也是华国锋。胡耀邦等来院后，华国锋主持了关于百家争鸣的科

学家座谈会。根据他的指示，胡耀邦等又连续召开了四次这样的座谈会。所以批胡等于批华。特别是这个柳忠阳，野心很大，敢直接向华国锋叫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于光远谈华国锋》，人民网，2012）

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2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天安门事件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他虽支持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但是当权后与“四人帮”的矛盾上升。我们当时听过他的一些讲话传达，如唐山地震时期的一些指示，都比较务实，和“四人帮”的论调有相当大的距离。他对胡耀邦和李昌，也未作任何正式组织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当然他肯定记得柳忠阳这个名字。于光远批评他过于软弱，我看他是绵里藏针。

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胡、李、王三人签署的，为什么只批胡和李呢？“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邓力群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大风出版社，2006）柳忠阳连个核心小组副组长也不是，却能兴风作浪，是因为在变幻无常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当权的领导干部无所适从。他们为了自保，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光把账算在柳忠阳这类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去世后，10月7日科学院核心小组开会，讨论建议将胡耀邦、李昌、武衡、胡克实等从核心小组里除掉，王建中回部队，柳忠阳、党文林、李先惠等三人增加为副组长。

他们的好梦不长。就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华国锋、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11月5日下午，揭发批判“四人帮”插手科学院罪行大会在北京召开，柳忠阳到会接受批判，很快被从核心小组除名。1977年初，中央把方毅派到科学院主持工作。

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书海泛舟】

梦断乌托邦

——读几本文革造反派回忆录

张光渝

引言

最近，陆续读了几本文革造反派的回忆录。一些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著书立说，回顾以往，吐露心声，这是一个好现象，他们为文革历史定位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坐标和视点。

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类著作只能在境外出版。根据本人搜集和阅读过的数量不多的文革造反派回忆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为自己伸冤的，代表作是《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记录文革初期“大翻身”经历的，代表作是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记录上海文革重大事件内幕的，代表作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有反思文革历史教训内容的，代表作是朱永嘉口述《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金光耀、邓杰整理，大风出版社）；

公开为文革唱赞歌的，代表作是王光照的《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这些著作，从文革造反派的视角体察文革运动的乌托邦性质，揭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一、文革造反派的心结

说起“文革造反派”，以上著作的写作者在文革之前都是清一色的革命政权的“依靠力量”，他们工作（学习）积极，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是各个单位的骨干分子。如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很受校长陆平器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学生，出身正，学习好，积极上进。这两个人文革期间位居闻名全国的“五大学生领袖”之列。徐景贤和朱永嘉都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朱还是大学教师），文革开始后投身上海造反、夺权，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徐景贤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而王光照则是大型国有企业武汉锅炉厂工人，16岁入厂，响当当的产业工人，文革中成为基层造反骨干，坚决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中始终积极投身“革命造反斗争”。

我随机选定的“造反派”人士（我只读到这几个人的回忆录），是一个由党务工作者、公务员、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社会主流群体，从整体上看，也正好符合文革造反派结构的基本状况。因为文革的特殊性质，“造反”是在现政权最高领袖的号召下进行，因此投身造反队伍的人都出自主流群体，他们政治清白，思

想激进，又不是“当权派”。文革不仅没有伤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反而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给了他们“奉旨造反”的机遇。

所谓文革造反派，有两个规定判断：从行动和组织上说，他们在文革中是攻击本单位、本地区党委和领导的带头人，是造反组织的骨干力量；从思想和政治倾向上说，他们拥护“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不论见没见过江青等人，都“与中央首长心连心”。本文所列书目的作者，都符合文革造反派的定义。即使他们其中有人后来升为主任、书记、当了中央委员，仍属造反派之列。

随着十年文革的落幕，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都成了失败者，被“赶下历史舞台”。如上述五位作者，聂元梓、蒯大富、徐景贤、朱永嘉都判处了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王光照则以“帮派体系骨干”身份，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予以撤销干部资格，留厂察看两年处分。

这几位人士职业不同、背景不同、文革造反履历也不同，但他们写的回忆录却有一个共同点：谁都不承认文革后向他们宣判或宣布的罪名。而且，虽然有已成定论的所谓文革“十年浩劫”，但读者从他们的回忆录中看不出什么“浩劫”的迹象，似乎也没有什么人遭受过他们的迫害，反而是他们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冤枉的。

请听他们各自的心声：

聂元梓这样评价自己的造反行为：“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我不过是在开始两年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我也没有自作主张搞什么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和中央文件规定的范围，没有超出党的政策所允许的界限。”（《聂元梓回忆录》网络版第23章。本文引用的《聂元梓回忆录》系网上刊载的版本，与纸质版的书上内容不完全一致，无法标明统一页码，特此说明。）

如此说来，聂元梓何罪之有，何错之有？更有甚者，聂元梓还在回忆录中强调，当年她在革命造反时，就“尤其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关、戚等人产生怀疑，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产生怀疑”（《聂元梓回忆录》网刊第17章），聂元梓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怀疑对象，很像是文革结束后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名单。显然，这样的表白是很难使读者信服的。

蒯大富不服气，他要大家分担文革的责任：“我也赞成一个同乡的观点，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包括造反派头头，也包括那些高干子弟，包括中央领导人，包括年满18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者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言行承担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要昧着良心躲起来，往另一部分人身上推，甚至利用权势，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更不应该把自己干坏事造成的后果往毛泽东主席身上推。”（《清华文革五十天》第105页）

蒯大富只认自己在清华大学搞武斗一笔账，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我有直接责任。我给红卫兵运动抹黑，给文化大革命抹黑，我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对我恩重如山，我辜负了毛主席的培养和信用。”（同上 第 105 页）注意，蒯大富认的不是参加文革造反的错，而是给文革“抹了黑”的错。

朱永嘉的回忆录《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最具理论色彩。他联系实际分析了文革目标的虚幻，论证造反夺权必然失败。朱永嘉以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夺权后的言行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内部演变为例，证实毛泽东以巴黎公社原则重建革命政权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要强力打破旧的机构并不困难，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模式，却不是那么容易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就想模仿巴黎公社的原则，但它照样会走过去的老路，一样要镇压给自己提意见的群众。在 1967 年底，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用事实证明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模式，并不能保证它不再脱离群众，不再与群众对立。这对‘一月革命’来说，才是最悲哀的。它意味着即便没有外来的因素，‘一月革命’在上海的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已申春秋》 第 348 页）

这是我读到的对所谓“一月革命”最客观最清醒的评价。从这点上说，《已申春秋》的成就高于其他几本回忆录。但是，朱永嘉不后悔，不认为自己有错。

朱永嘉申明：“回首审视这许多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信仰，无论此前此后，我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经得起审视和检验的，没有愧对我当年参加革命的誓言……”（同上 第 400 页）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很独特，既无前言，也无后记。书中记述亲历亲闻的上海文革若干重大事件，从回忆录的章节题目看，他的选材有揭露“上海帮”的意味，如“江青择婿记”、“江青插手《白毛女》的前前后后”、“张春桥‘九大’整陈毅”、“游雪涛小组解密”、“邓小平‘策反’马天水”等等。而徐景贤对自己文革中的言行基本上只记录，不评价，似乎是抱着“历史任由后人评说”的心态写这本书的。

徐景贤和朱永嘉是被指控参与上海预谋武装“起义”的两位骨干人物，但他们在写作回忆录时，都用不同方式敷衍或回避这件重要史实。徐景贤将当年在法庭上的证词全文附上，除此再无一字，读者无法判定他的真实态度。而朱永嘉则将回忆录的题目限定为“文革初期的两件史实”（批判海瑞罢官和上海一月夺权），对动员武装上海民兵事件不置一词，比徐景贤还彻底。朱永嘉所谓“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愧对我当年参加革命的誓言”，是否包括这件事？

王光照是公开坚持文革立场的作者，他的回忆录自始至终强调，他和他所代表的造反派在文革中是正确的，革命的，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念念不忘当年革命造反的辉煌业绩，因此他在回忆录的结尾说：“我曾经叱咤风云、恣意纵情地

搏了一回。俯仰无愧天地，中间对得起人。”“我不改初衷，在人生的漫漫苦旅中，负重前行。”（《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 637 页）王光照在文革中几次被拘押，被批斗，被审查，但造反信念毫不动摇。他比其他四位作者有更多“革命造反派”的特质。

综上所述，文革造反派的心结可以归纳如下：

——文革就是要工人阶级掌权，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清算压迫人民群众的当权派。

——文革的目标是崇高的，伟大的，它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是正确的。反对文革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是毛主席要打倒的特权势力。

——如果说文革错了，那也是党中央的错，我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何错之有？那些当权派、保皇派、高干子弟没有拥护过文革吗？没有犯过错误吗？凭什么只整我们？

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是文革造反派对自己造反行为的典型认知模式。

但是，无论冤枉不冤枉，甘心不甘心，他们毕竟失败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这要看什么环境，什么背景。失败了的造反派纷纷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撰写和出版回忆录，吐露自己的不平和冤屈，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有三个背景：

第一，如今的社会开放程度有所提高，造反派的著作可以在境外（主要是香港）出版或在网络发表，而作者一般也不受追究。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他们即使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出版。

第二，文革从结束算起，至今也已经四十年。这个时间变化，意味着亲历文革的人越来越少，而没有经历文革的人越来越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刚刚结束文革噩梦，全社会普遍对文革造反派深恶痛绝。那时候即使有人想为他们出版回忆录，他们也不敢写。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贪污腐败、道德滑坡，党政官员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肆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日益蔓延。这一切很容易使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一代和对现实不满的人们被造反派回忆录慷慨激昂的造反、夺权之类记叙所感染，产生共鸣，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实际上指的是再来一次文革前期的那种造反、夺权）。

第三，当年的造反者平均年龄小于“被造反”的当权派、学术权威、“叛徒特务”。随着岁月流逝，当年“被造反”的人离世数量多于造反者离世的数量。比如，这五本著作出版时，作者能说出几位当年被他们造反冲击，还仍然健在的人？虽然那部分人生前也有一些回忆著述，但因为环境所限产生了时间差和位置差——那部分人回忆时造反派没有发言权；那部分人回忆的视角和写作出版条件

也是造反派所没有的；而当造反派有机会发言时，他们当年“对立面”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故去，双方没有了质证的机会，造反一方得到后发制人的优势。

由于官方对文革历史的全面回避，逐渐失去了文革史话语权，而港、台等境外的文革出版物则长盛不衰，为“体制外文革著作”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官方只好加紧封锁，陷入恶性循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革造反派的回忆著作进行研读评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紧迫的。这一代人不想说、不敢说、不许说，等这一代人过去，就更难说清楚了。

二、文革运动不可克服的三大矛盾

本文试图从文革的根本错误说起，证明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政策、手段、目标都是错的，都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危害的，投身于其中的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文革的根本错误不是指不该打倒刘少奇，不该重用江青、张春桥，也不是整错了多少人。相比起根本错误，这些都只是具体表象。

文革的错误，或说失败的必然性，植根于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专政制度与“大民主”的矛盾；

第二、集中权力与发动群众的矛盾；

第三、延续传统与更新政权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可回避，不可调和，决定了文革无论打倒谁，启用谁，都绝对是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第一、专政制度与“大民主”的矛盾

文革受造反派拥护，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提倡的“大民主”：下级可以批判上级，群众可以反对党委，造反组织可以接管权力。“走资派”、官老爷被打翻在地，人民大众扬眉吐气！但这真是“大民主”吗？在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时候，对立面群众组织怎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黑线”人士怎样？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怎样？长期成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怎样？他们的民主权利在哪里？答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不然搞文革干什么？

这就是“大民主”吗？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中有一篇署名“碧侠”的附录：《〈高校文革五十天大事记稿〉编撰说明》，作为清华文革五十天的背景材料。在这个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从现代民主政治角度公正地讲，群众审视，批评领导，试图改换、罢免领导人，或者赞成、维护领导人，都是一种自我政治选择，人民群众当然有这些选择的自由，这也是巴黎公社主张的一种信念。中国人面临民主选择，缺乏理性和宽容，非闹到两派尖锐对立，不保即革，不革即保，

一方吃掉一方，其实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表现。但是，对于普通公民乃至对于青年学生的民主尝试，非得体制性地保护一类，镇压另一类，这不能不是一种专制政治的体现，可悲的是，这种专制又往往以形‘左’而实右的方式出现。”（《清华文革五十天》第418—419页）

我不知道碧侠是谁的化名，但这是一段看起来十分精彩的议论，如果没有最后那句“形‘左’而实右”的限定，它已经完美揭示了文革的深刻矛盾。作者指出，是“专制政治”造成了未能实现巴黎公社由“人民群众”“自我政治选择”的“信念”。

实际上，只要把这段话扩大到文革全过程，就清晰可见专政制度和“大民主”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的，刘少奇文革初期的作为，确实是把造反的部分学生和群众当作敌人对待，体现了“专制政治”。但是，难道专制政治仅存于这五十天吗？在刘少奇被剥夺权力之后的整个文革过程中，通过“体制性地保护一类，镇压另一类”，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各种名号的阶级敌人，被批斗，被流放，被关押以至失去生命，这是一个至今没有确切结论的庞大数字。再说，1966年以后的文革中，中国公民有“赞成、维护领导人”刘少奇的自由吗？蒯大富和“碧侠”承认这种自由吗？这是典型的“专制政治”。这不是什么“形‘左’而实右”，是极左；这也不是只有“五十天”，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做的，不是否定毛泽东还是否定刘少奇的争议，而是对专制政治的整体反思。文革的实际过程，是在巩固和强化这种专制政治。

造反派们都喊委屈，控诉“走资派”对他们的打击迫害，剥夺了毛主席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说实话，讲文革整“走资派”、老干部，并不完全。其实被整的群众数量并不少于各级干部。一般来说，夺权阶段、反“二月逆流”阶段、批林整风、批林批孔阶段、“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主要矛头是对着领导干部的。但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等阶段中，被整的却主要是包括造反派头头在内的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甚至像“抓五一六”还主要是整的造反派。“整”的形式包括批斗、抄家、游街示众、强制迁徙、强制劳改、剥夺政治权利、隔离审查（有的以“办学习班”为名）、开除党籍或公职、变相关押或正式入狱（甚至公审后枪毙）等等。这方面的经历，聂元梓、蒯大富、王光照都是亲身体验者，他们都在回忆录中具体写到了自己被关押被批斗的过程。他们的回忆录在写到这些内容时，总是竭力把这种遭遇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区隔开来。

于是，就形成了文革“大民主”中，被冲击的老干部喊冤，冲击老干部的群众组织也喊冤；“右派”（保守派）喊冤，“左派”（造反派）也喊冤的匪夷所思的局面。本来，民主应当保护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文革运动却使工人、农民、

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科研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普通市民以至公检法人员和军人都受到了冲击和压制，这恰恰反映了“专制政治”制度与所谓“大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这一切过程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起、亲自部署的，是文革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造反派代表人物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证实：“8341 部队把我关起来，就明确地对我说，是毛主席批准把我关起来的。”（《聂元梓回忆录》网络版第 18 章）8341 部队是“御林军”，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毛泽东既可以批发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又可以“批准”把聂元梓关起来。这既算是发扬文革“大民主”，又算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切随心所欲。

徐景贤的回忆录讲述了 1967 年夺权高潮中，上海锦江饭店的某派造反组织为求见张春桥、姚文元，获取中央首长的支持而采取关停电梯，当面要求与张、姚对话的所谓“电梯事件”。张春桥、姚文元大怒，事后下令严查“长胡子”的后台。这个历时仅 28 分钟的“事件”，使带头的汤某被“专政”了八年，差点丢掉性命。汤某感慨道：“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十年一梦》第 87—91 页）

所谓的“大民主”能大到什么程度，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意愿，这是文革“大民主”的实质。而相当多的造反派们至今还在怀念这种“大民主”！

放眼往前看，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一点也见不到民主的影子，都是基于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极左的实践。再往前看，自列宁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无论领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实质上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找到与人民民主的契合点。毛泽东声称要通过文革找到这个契合点，试图“发展马列主义”，但结果却是空前强化了个人专制，一党执政几乎变成了一人执政，与人民民主背离得更远。一些造反派一方面控诉自己文革中被“迫害”，一方面对文革大唱赞歌，怀念乌托邦式的“大民主”。只要他们不能从这个悖论圈子里走出来，他们就将终生不得安宁。

我认为，研读文革造反派回忆录，最好要亲历过文革，方能与回忆录作者站在同一平台上对话。比如，没有亲历过文革的青年人，很容易以为只有刘少奇的“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是“专制政治”；以为蒯大富与刘少奇作斗争是为了争取“现代民主政治”中“选择的自由”；以为蒯大富等人真的“不是‘奉旨造反’，而是被反动的镇压‘逼上梁山’”（《清华文革五十天》第 418 页）。只有“过来者”清楚，在被“反动的镇压”之前，造反派们做了什么。没有毛泽东一道又一道“圣旨”，他们根本不能起来造党委的反。蒯大富当时生怕思想改造跟不上党组织的要求，他还在文革运动初期提出了“捍卫校党委，

就是捍卫党的领导”的口号。（同上 第 11 页、第 15 页）蒯大富不是“奉旨造反”，谁是奉旨造反？

第二、集中权力与发动群众的矛盾

文革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的不同，在于加入了鼓动群众造反的内容，“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毛泽东在中南海门口直接向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说：“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连续多次检阅百万红卫兵，支持大串联，都是为了能够发动群众。

不过，亲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群众是为了打乱旧的党政机构，彻底清除刘少奇、邓小平主管多年的组织人事体系。以 1969 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为标志，发动群众就开始转为集中权力了。首先，在“九大”之前就以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形式进驻学校、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三支两军”等名义接管造反组织的权力，稳定局势，为“九大”召开创造条件；其后进行机关厂矿和单位的“斗、批、改”等运动；推广 8341 部队在大学、工厂“清理阶级队伍”的“先进经验”，运动转向在基层开展阶级斗争，清理门户。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保皇派、骑墙派甚至与世无争的观潮派，都可能被卷进去吃苦头，而造反派吃苦头的更多。

王光照所在的武汉锅炉厂造反组织，就是在发动群众造反夺权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到了 1968 年就被解散了。衷心拥护文革、紧跟毛主席的王光照也想不明白：“堂而皇之的党中央决定，什么‘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云云，怎么到了 1968 年夏天，来了一个批判多中心，铲平山头，管你什么组织，倒旗完事？”（《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第 24 页）王光照所说的“堂而皇之的党中央决定”，指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那里面的第九条明确规定，为了实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目标，文革运动中应当建立“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殊不知，打乱权力机构需要群众组织，而重新集中权力，就必须铲平山头，解散群众组织。不知王光照现在想明白没有：手段为目的服务，群众造反组织只是夺权的工具和手段。如果王光照们还认为群众组织被解散是“走资派”反攻倒算，那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

大学历史老师朱永嘉比王光照看得清楚，理解得深刻。他解释毛泽东发动和支持小人物造反的动机说：“他的立足点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大众倾斜，这又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群臣的一种手段。”“但从历史上看，小人物的结局都不好。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轻、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

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巴申春秋》第5页）

但是从蒯大富和王光照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可悲”，他们至今还保持着对发动他们这些“小人物”造反的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其实连张春桥对上海的造反派都是利用态度。朱永嘉说，张春桥对王洪文和工总司的那些人究竟几斤几两，“心中有数”，对他们“始终心存戒心”。他更对国民党军队“解放战士”出身的耿金章直言：“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你们工总司几个人的材料我全看过。过去市委不是说你们工总司的一些头头都是社会渣滓吗？我对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总应该有所了解呀。”（《巴申春秋》第279—280页）张春桥表面上支持工人造反夺权，实际上不屑之意溢于言表。他在1967年6月3日的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将包括王洪文在内的造反派臭骂了一顿，什么“流氓无产阶级”、“封建行会主义”、旧上海“流氓打群架”等等，什么难听说什么。而那帮“工人领袖”们“坐在底下一个也不敢吭声。”（同上第311—312页）

所以，全国夺权一开始，毛泽东就用“三结合”的“马列主义新发展”代替了他反复申明的巴黎公社原则。他曾对中央文革下达指示：要按巴黎公社原则组建新的权力机构：“干部要选举，随时可以撤换，不是任命制”。（同上第275页）但若真的付诸实施，这种“不是任命制”的选举就会和中央集权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单说上海，谁有选举权？谁有被选举权？陈丕显、曹获秋有吗？同属工人阶级的“保守组织”赤卫队成员有吗？广大上海市民有吗？如果有，选举结果会如何？如果没有，工总司一派演投票独角戏，有任何意义吗？这样不经任命就产生的地方政权，对中央集权会产生何种冲击？

现实无情，毛泽东只能自食其言，改以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造反派）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实行协商产生，报上级（中央）任命的办法。实际上连“协商”名单都是事先经过批准的。军队代表则根本不需要协商，他们加入革委会，是上级派来主持大局的。上海是“一月风暴”策源地，例外地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亲任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委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是张春桥一手指定，压根没什么选举。朱永嘉说，巴黎公社原则之所以无法实行，“因为权力的架构是集权式的。在中央最后的裁决权在毛一个人身上，在地方也是如此。上海的最后裁决权是张一个人说了算，而且权力的运作过程也不透明，权力结构内的各个成员只对一把手，也就是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记说了算。”（同上第308页）对此，朱永嘉遗憾地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本身不应该是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他的目标应该是毛在文革初期反复讲的过去历次运动没有解

决的党政机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同上 第 293 页）

巴黎公社原则的流产就是人们常说的“穿新鞋，走老路”。但这不是毛泽东能解决的问题，即使他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一言九鼎。悖论就在于，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集中的个人权力，巴黎公社原则才不可能实行，而必然成为空幻的乌托邦——中央集权和自行选举不经任命的地方政权无法兼容。文革无法实现所宣示的目标，因为集权和官僚主义共生，就算是“无产阶级集权”，就算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集权，也一样。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在国际共运史中从未得到实施的根本原因：一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的两大前提互相冲突，无法共存。

第三、延续传统与更新政权的矛盾

文革“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试图用大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新鲜血液”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林彪事件后，他挑选造反派出身的工人领袖王洪文为接班人，在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大幅度提高工农兵基层委员的比例。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披露了上海代表团在“十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夕，漏夜电话补报候选人名单，将根本不是“十大”代表的十余名上海基层造反派空运至北京，加入中央委员会的过程。这项工作之紧急，之保密，以至于有人以为把自己召来北京是为亚非拉乒乓球赛服务。

“十大”以后，中央委员会来自上海基层的委员中，一些人担任了下列职务：

上钢一厂车工周宏宝，任教育部副部长；

上海 5703 厂工人祝家耀，任公安部副部长；

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冷作工张国权，任六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等等。（《十年一梦》 第 272—273 页）

不过，毛泽东换来换去，最后的党政军主导大权，依然要放到职业革命家——老干部手中，也就是跟他打江山的老人手中。无论是华国锋还是纪登奎，无论是陈锡联还是李德生，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新政权，没有一个是工农“造反派”当一把手。陈永贵是闻名全国的标杆式农民，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可陈永贵能当摆门面的副总理，却当不上山西省革委会主任。

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以至于张春桥都不得不承认，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必须启用老干部。他说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要有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很多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比如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嘛。”（《巴申春秋》 第 280 页）

但是这些老干部，不管毛泽东如何信任，如何倚重，也不管他们对毛泽东如何忠诚，如何拜服，他们同从基层上来的造反派都有天然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无法解决的矛盾。许世友是毛泽东的“愚忠”者之一，同时也是对造反派最反感的领导干部之一。他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表达这种反感。据邱会作回忆，“九大”期间的1969年4月11日，在他参加的一次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范围会议上，“许世友愣头愣脑地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的。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对许世友提的这个问题，没有人敢附和。”（《邱会作回忆录》下册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第626页）

这就产生了延续传统与更新政权的矛盾。

毛泽东当然知道有这种情绪的不止是许世友一人。而这个矛盾恰恰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他想用鼓动群众造反的办法打倒所谓“走资派”，用群众造反施加压力的手段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将代表传统势力的老干部弄到了“民主派”、“走资派”一边，需要经过造反派冲击甚至批斗的考验后才能继续工作，这就将双方搞成了互为敌手的对立面。老干部与造反派的矛盾绝不是年龄差异的矛盾，所以毛泽东在提拔重用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时，为了说服老干部而列举的历史上年轻人可以干大事云云，都是文不对题。

——毛想借用军队的力量维护被他搅得天下大乱的局面不致脱轨，让军队主导新生的革命政权。但是，军队恰恰是最讲传统、最讲纪律、最讲资历的团体，他们与造反起家的那一群人格格不入，而与已经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却有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天然联系。张春桥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有“杀头”的思想准备，（《十年一梦》第403页）最重要的原因是军队不在他们这些造反派后台一边。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抗议群众涌向人民大会堂，被解放军排成人墙挡住。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观察广场形势的张春桥事后对自己的秘书肖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把枪口掉过来，那该怎么办？！”（同上第401页）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远不是现在这样的干群关系。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使群众形成了拥护党中央，服从党组织领导的习惯。即使是蒯大富、王光照这样的造反派领袖，在文革开始前也从未想过要造老干部们的反。那时的大学生蒯大富对党，对国家充满感激之情，生怕自己思想改造跟不上组织的要求，“根本没有想过什么造反”。（《清华文革五十天》第11页）而王光照则在回忆录中深情描绘了1965年开展四清运动以前，

武汉锅炉厂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号召造反夺权，打倒老干部，冲垮各级党委，就必然遇到极大的阻力，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比如，在文革最高潮的1969年“九大”上，领头造反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山西刘格平、张日清，贵州李再含，山东王效禹，四川刘结挺、张西挺等都遭到代表们的质疑，他们都是在大会组织者“做了不少工作”的前提下，才以很低的得票数在等额选举中勉强当选中委或候补中委的。（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这些人在“九大”闭幕之后不久，就先后被清理出局。造反之不得人心，岂是毛泽东一人之力可以逆转的？

一个车间工人，仅凭造反就可以当部长，当中央委员，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会服气，何况还有各种对立派别的群众。这就使造反派在民意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老干部和靠造反起家的“新鲜血液”在掌权的资格上完全不对等，虽然后者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提携。老百姓信服老干部掌权，而不信服造反派掌权——1973年我在部队当兵，就当场听到一位农村出来的战友指着中共“十大”宣传栏上王洪文作报告的照片公开说：王洪文凭什么当副主席？他接班我不放心！问题在于，他这样说了，兵照当，党照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反上来的“新鲜血液”如何站得住脚？王光照这样的工人造反派，以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身份自居，完全不考虑自己有没有民意支持，有没有民意基础，以为只要毛主席给他们撑腰，就可以打遍天下。但是到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王光照受到了极大震动，他感到“十分惊愕”，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事，也不是什么胜利。这是乱世的征兆，也是社会动荡的重大标志。”他自问：“是什么重大的社会矛盾孵化出了这么多反革命？”（《这里那时潮起潮落》第464页）

问得好！文革就是一场脱离中国社会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政治动乱，它是当时一切“重大的社会矛盾”的根源。文化大革命是仅凭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无限制的权力强行发动起来的，借用王光照的话说，就是“霸王硬上弓”。包含着一系列自身不可克服矛盾的文革运动，只能成为乌托邦梦想。这个结果，毛泽东本人生前就已经看到了，他晚年对外宾谈话时承认：他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周围。实际上，他连“北京周围”也没有“改变”成功，否则不会发生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在世的毛泽东公开说“不”的天安门事件。如此说来，文革中追随毛泽东“革命造反”的人，也就必然要失败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的理由。

结语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要面对文革造反派们的未了心结。

王光照被处分后，领取每月 30 元的“生活费”，直到 1995 年办理退休手续，以至于无法填写退休表格中“工资”一栏的数据。（《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第 637 页）这确实不合法不合理。他有怨气，要申诉，这是他的正当权利。不过，如果据此寄托于文革，反证文革的合理，那就选错了路径。

其实王光照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他十六岁入厂当工人，成为技术骨干，但却有特殊的政治天赋。他有极强的演说本领，当年作大批判报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两个小时的报告没有文字讲稿，旁人看不懂的提纲只是写在烟盒纸上，一气讲下来，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紧凑，流畅，观点准确，旗帜鲜明，抑扬顿挫，具有相当大的感染力。否则哪个愿意站着听你瞎吹神侃呢？”（同上 197 页）这种本领与学历和职业无关，而与政治热情有关，与天赋的才能有关。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王光照养成了研读报刊和政治理论书籍的习惯，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认真读过的马列著作至少包括：《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国家与革命》等等。他琢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必先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用通俗的方法理解“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认定自己被当作“帮派体系骨干”整肃，受到了“屈辱”和“奴役”，所以他要捍卫“人的最高本质”。（同上 第 280—281 页、第 614 页）

这确实很令人惊异。按说王光照这样的人，如果在某种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工人领袖，组建或加入政党，参加大选，到各处宣讲政纲，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堂堂正正成为一个政治家。他不需要忠于谁，不需要喊“万岁”，只需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政治斗争，胜利了是执政党，失败了是反对党，不会被“办班”，不会被批判，不会写检查交代，更不会蹲监狱。但王光照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接受的却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灌输，选择的是“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道路。既然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就肯定有你死我活的胜负之分，可以不讲法律，可以冲破一切“条条框框”，甚至可以“霸王硬上弓”。王光照在 1969 年的“反复旧”演说中理直气壮地宣称：“说到打、砸、抢，这恰恰是我们革命性的生动体现。”“坚决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抢回这些被他们篡夺去的大权。这就是造反派的结论，这样的打砸抢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同上 第 200 页）

这是王光照式悲剧的根源——靠打砸抢夺权，即使成功了，也没有安全感。而一旦失败，就是没顶之灾。

只要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人鼓动的，投身其中就要承担风险。如果打着革命的旗号造反，成功了是大英雄，失败了却不负任何责任，个人利益没有任何损失，那还叫革命吗？那叫投机！至今还为自己的造反行

为喊冤枉的、不服气的人想过没有，文革中那些被革命造反打下去的蹲监狱、受审查、被批判、罚劳改、只拿很低的生活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小爬虫”等等总共有多少人？残酷的事实摆在那里，绝不是不写进回忆录就可以掩盖的。这样的结果符合马克思所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本意吗？

请看马克思的原话：“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9 页）我的理解，“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要通过摆脱宗教迷信和对人的各种奴役和驱使才能体现。但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引用这句话时，却删去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之前的规定性词语。他所理解的“人的最高本质”，在文革中已被异化为通过“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式虔诚而换取的护身符。如朱永嘉所言，那些被大人物利用的“小人物”，除了“感恩戴德地效忠”之外，“很难有独立的人格”。王光照却一边沉浸在“感恩戴德”中不能自拔，一边声称要捍卫“人的最高本质”，令人无语。

王光照以 30 元生活费的待遇工作到退休，这肯定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当时给他的处分决定是“留厂察看两年”，两年后如果不开除，就应当恢复工人的资格。“文革造反派”是一个历史标签，不是法定身份，他们应当享有中国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蒯大富虽未能留在北京（他说是王光美坏了他的事），却在深圳干得很好，落了户口，发了财。他现在绝对不受歧视，他是名人，是报社记者追逐的对象。

关键在于，无论是从王光照的拮据出发，还是从蒯大富的致富出发，都应该归结于民主和法制，归结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应该得出重演文革运动的结论，也不会有发起文革运动的前提条件。文革的前提条件是：一位有绝对权力和十足勇气，敢于煽动全国造反夺权而确信自己不会被推翻的“伟大领袖”；千千万万出于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效忠追随的“革命群众”。应该说，这两个前提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退一步讲，即使再来一次文革，依然要面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大民主”的根本性矛盾，最终导致革命的变质和失败。实践证明，企图用“大民主”的造反夺权方式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此路不通。极而言之，如果真有下一次造反和动乱，带头的将不再是王洪文式的人物，而是瓦文萨式的人物。可惜，那显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也不再是王光照念念不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失败，不在于什么“失误”，不在于什么“被利用”，借用朱永嘉的话说，即便没有外来的因素，文革的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由这个理论派生出

来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愿景，无论有多么崇高的理念，无论有多么辉煌的包装，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积极参与其中的人，也就必然要付出失败的代价。

【书海泛舟】

浅谈《历史拒绝遗忘》的特点与意义

张 从

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的出版，是清华 100 多年校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国的文革历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是留给后代的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

这部文集的特点可用四个词来概括：典型，真实，深刻，包容。

清华文革在北京市高校文革乃至全国文革中是具有典型性的样板，清华是“两个司令部”交锋的重要战场，是学生造反派起家的摇篮（包括清华附中），蒯大富是造反派领袖的代表性人物。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从打“黑帮”、反工作组、“反干扰”……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与清华密切相关。对清华文革的研究无疑具有典型意义。文集中许多文章对清华文革中的重要事件和背景及其在全国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记述和分析，对全面研究文革历史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革已经发生了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革命小将”都已经垂垂老矣，怎样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文集的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相，作者中包括各派的学生、教师、干部，还有军宣队员和外地的中学生，他们记述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其中武斗和无辜师生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场景虽然十分血腥，但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但愿这样的场景永远不再重现。

如果只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的事实，文集的作用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文集的深度就在于它的反思。当年的各派师生，能够从历史、社会、哲学、体制、人性等角度对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也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检讨，例如学生中的阎淮，教师中的林贤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的文章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罗征启老师文革后对当年斗争过自己的学生的宽容和帮助，更使读者感动。文集中其他许多文章对文革的思考，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清华的团派和 414 派在文革中的对立是相当严重的，

1967年至1968年，两派从大字报、广播攻击发展到严重武斗，在武斗现场上死伤人数也是北京高校中最多的。文革后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但一些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有分歧。文集的主编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征集到当年两派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经过顾问审阅后再反复修改，发表出不同看法，是具有相当广阔的胸怀的，文集的兼收并蓄，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和思想的多样性。

文集对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文革历史的研究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地院、北大等高校的校友正在以文集为参考，开展文革研究，有望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出版重要的文革历史研究作品。

巴金先生生前曾经倡议成立“文革博物馆”，以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遗憾的是他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其实民间一直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文革博物馆”，既有文字，也有图片，还有实物；而且，在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的心中，也都有一个“文革博物馆”，那就是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

这部文集，已经被清华、全国高校、各地的图书馆，甚至国外的图书馆收藏，更被众多的读者阅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民间的“文革博物馆”，成为重要的藏品。文集主编者和各位作者的心血不会白费，必将永远印记于青史。

【史实考订】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吗？

湖滨散人

我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特定意义上的接班人。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又重新考虑和挑选接班人。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华国锋和北京的吴德三人到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与筹备中共“十大”。那个时候，华国锋就是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是当时接班梯队的重要成员之一。至于具体如何接班，接哪个人的班，什么时候接班，那时还是一个未知数。我这里所说的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应该是在毛泽东离世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人选。现在有很多书籍和文章都众口一词说，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甚至还说是毛泽东重病的时候亲自指定的。笔者长期以来关注这方面的历史材料，觉得这个说法还缺少历史材料的依据，客观事实不一定如此。质言之，华国锋还不一定是毛泽东确定的中共中央主席的人选。

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材料中，我们很难找到毛泽东确定华国锋接自己的班的直接证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宣传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曾经面授其手谕：“你办事，我放心。”当时的诗人、作家、音乐家、画家也以这句话为主题写成诗歌、散文，谱写歌曲，绘成画作，以此来表达拥护中共中央的揪出“四人帮”，确立华国锋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举措的心愿。据传，当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毛泽东也曾写过类似的字条，这些说明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迈体衰，“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¹，他是采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并没有特殊的微言大义，更不是要作出人事安排方面的决策。即令是毛泽东只跟华国锋写过这样的字条，这句话也绝对不是“我走后你来接我的班”的意思。当然，当时公布的毛泽东写的字条中的话还有“照过去方针办”“不要着急，慢慢来”等等，这就更和要华国锋接班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了。

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首先第一条标准就是要紧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为文革唱赞歌，评功摆好，底线是决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想当初，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历史性的决议，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为由加以婉拒，因而激起毛泽东强烈不满，以至于不惜将邓再一次打倒。当时符合这条政治标准的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当然华国锋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他在成为党政军“一把手”之后，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明证。

但是，华国锋长期以来担任地方领导职务，实事干得不错，理论水平不高，在官场中人脉资源有限，因此，他在这些领导人中，应该不是毛泽东特别属意的、愿意把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交给他的人选。特别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问题上，由于先天的局限性，华国锋更是难有大的作为。张春桥在理论上的建树是华国锋所望尘莫及的，政务能力也不错；江青在政治上的坚定性也是华国锋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又有毛泽东夫人这个金字招牌。其他几个人也各有优势。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人中某个人担任党中央主席或许更加适合，实际上，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²。

周恩来去世后的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³，

¹见阎长贵、杨银禄《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

²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记载：“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³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会议也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议。

主要是为了消弭左右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议，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说毛泽东亲自挑选华国锋做自己的接班人，在他身后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缺乏充足的依据。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安排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并不意味着党中央主席也非他莫属，这是两码事。

其次，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作为统领全党全军全国的统帅，必须是帅才级别的人物。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说他绵里藏针，说明他对人才的认识是清醒的。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曾经谈到刘少奇做自己的接班人的地位问题。刘少奇是有这个才能和声望担当这个大任的。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的威望日隆；特别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刘少奇主持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让国民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功不可没，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大有取毛而代之之势。但是他的“接班人”资格被毛泽东剥夺，最终死于非命。林彪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甚至是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认了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的一位得力猛将、爱将，军事上的帅才。不过经济上是不是行家里手还难说，政治上能不能够整合左右两个派别，还是一个未知数。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之前，官高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虽然也是朝廷重臣，但是无论是政务能力，还是个人威望，和刘少奇、林彪这两个人物比较，显然都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政治才华应该是心中有数，他说华国锋“厚重少文”，说他是老实人，是正面的评价，言下之意就很清楚了。他明知华国锋并非帅才而让他主政中央，做一把手，也是值得怀疑的。华国锋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6月最后黯然下台就是他难当大任的明证。

再次，无论是中共建政史上，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一般由一个不兼任其他重要职务的能力非凡的人士担当，而且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第一书记）一般是不兼任这个职位的¹，如中国的毛泽东之与周恩来，胡耀邦之与赵紫阳；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之与柯西金，戈尔巴乔夫之与雷日科夫；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之与谢胡；越南的胡志明之与范文同等。从情理上分析，毛泽东决定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总理，那么，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不可能让他还兼任党中央的主席。既担任党的主席，又担任国务院总理，就能力和声望来说，华国锋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即令有毛泽东或周恩来那样的威望和能力，要担当好党中央的一把手和政府首脑这两个重要职务，亦非易事，更遑论华国锋这样身份和能力的领导人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应该心知肚明，在临终之前，要把党中央的这一副担子撂给华国锋的可能性比较小。

¹苏联时期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既担任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同时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后苏联的这种格局没有沿袭下来，说明这种格局是不适当的，毛泽东未必不明了。

华国锋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同时担任党中央一把手，军队的最高统帅，又兼任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这种情况在华国锋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现过，可以说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安排人事上，按照常理，是不大可能让一个人身兼这两个重要职务的。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在 1976 年 9 月 9 日临终之前，并没有确立好由谁做中共中央一把手这件事情，这可能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

一是他自己原来确立的几个接班人都没有和自己处理好关系，不听他老人家的话，甚至于挑战他老人家的权威，现在要挑选接班人有些举棋不定，左右为难：听话的没能力（如华国锋、毛远新），有能力的不听话（如邓小平）；或者既无能力又不听话（如王洪文），或者虽然有能力，也听话，但是人缘关系太差（如张春桥、江青），得不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支持。

二是因为他老人家还没有估计到自己的生命历程很快就会结束，甚至他可能还认为历史老人会眷顾于他，让他能够从容地处理好那些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没有能在自己意识还很清醒的时候作出决策，而等到弥留之际，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安排好这件事情了，因此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前并没有最终的方案，没有确定由谁来接替他，在他的身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前几年有网络传言，说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 年）4 月至 7 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又曾在 7 月 15 日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的领导班子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对这一传言，汪东兴（健在时）、毛远新和张玉凤均予以否认，斥之为“谣言”，“胡说八道”。有些学者也提出质疑。）

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有一个小插曲：会上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剑英的意见，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载《炎黄春秋》2013 年第二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生前并没有指定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在毛泽东去世后，无论是“四人帮”一方，还是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另一方，都拿不出足以证实自己才是毛泽东的正宗继承人的尚方宝剑——毛泽东最终确立继承人的书面文件或口头交代。

最后，双方不得不凭借手中的实力和民心的向背来较量，“四人帮”最终覆

灭，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实力派、元老派取得胜利，实际上是政治实力和民心向背所演绎出来的结果。

【阅史漫笔】

文革历史写作中一些历史名词的使用问题

何 蜀

在阅读有关文革历史的著述时，常会遇见对一些历史名词使用不当的情况。有的是作者对该历史名词的产生背景及具体内涵缺乏足够了解，有的则是有关编者做了画蛇添足的错误处理。特别是在一些本来不错的著述中看到这类问题，就会有吃饭时牙齿嗑到沙子似的不舒服感觉。

用得最滥、出错最多的“造反派”

有关“造反派”一词的滥用、错用，已经有不少人提到了。最近在阅读中，仍不时遇到。

由王戈、王作人合著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作家出版社 2015 年 6 月版）中，第五章“魂断‘文革’”写了文革初期的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其中写到：1966 年 6 月 2 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李贵子得到省委副秘书长交底（告诉他“江隆基不是自己人”），模仿聂元梓大字报的调子，写出了炮打江隆基及兰大党委的大字报《学校领导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李贵子的大字报得到甘肃省委支持，省委工作组公开宣布李贵子为“革命左派”，并策划成立了“李贵子小组”，书中说，李贵子就“掀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拉起山头”（该书第 304 页），从此兰大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多数派，矛头指向工作组，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工作组”，另一派就是李贵子为首的少数派，坚决保卫工作组，按工作组的旨意把矛头指向以江隆基为首的校党委和为江隆基仗义执言的广大学生。6 月 7 日，两派学生大辩论，反工作组一派占了上风，并从质问工作组进一步质问省委：“工作组为什么要包庇李贵子”。这就是兰州大学文革史上有名的“六七事件”，省委将其定性为江隆基策划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学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省委决定增强工作组力量（扩充为工作团），并组织动员工人农民准备反击“右派学生”闹事。7 月底，李贵子在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时又见风使舵表示批判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李贵子一伙在学校

独掌大权。就在工作组执政、李贵子一伙横行的“七十天白色恐怖”（比北京等地高校的“五十天”还多出二十天）期间，6月25日，江隆基愤于省委将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的无理决定，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十分清楚的是，被省委工作组指使到前台冲杀，被省委当枪使的李贵子，不是造反派，他更不可能在1966年6月工作组执政期间就能“扯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人敢提“造反有理”这个口号。直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公开接见红卫兵，官方媒体公开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8月24日）之后，“造反”这个历来犯忌的贬义词才成为时髦的褒义词而广为流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才开始传遍全国成为造反派的信条。

李贵子一伙虽然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兰大校领导，后来也批判工作组，但他们不是造反派，他们一直是得到省委明确支持的。当然李贵子也不同于那种纯粹由官方组织和操纵的保守派，而是地道的投机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政治扒手”。兰州大学在“六七事件”中反对李贵子和工作组，进而对抗省委，被省委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多数学生，才是造反派。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除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再无任何领导敢于将其打成“反革命”外，其他当时给本单位、本地区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凡是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等等）的，就是造反派；凡是所写大字报得到上级领导支持或授意，并未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就不能算造反派。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在写到工作组执政时所倚重的“左派”时，反复使用了“造反派”这个称呼，如：6月16日批斗江隆基时，说江隆基由“从‘坚强造反派’中认真挑选出来的几名强壮大汉”揪上主席台（311页）；不到十天，这样的大型批斗会开了四次，不斗的时候就“在造反派的指挥棒下游街示众”（313页）；“6月21日，第三次大会批斗后，几个造反派押送江隆基回家。”（315页）……这些地方，写的都是工作组执政、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肆虐时期的情况，那时工作组依靠的“左派”打手们绝不是“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在这个时期正处于挨整受压状态，哪能有这样的“风光”？这应该是有过文革亲历的人们都明白的基本常识。否则，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斥责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岂不成了造反派制造的了？文革之后以打击造反派为目的的清理“三种人”，岂不是应该把当年的工作组及派出工作组的上级党委领导人也一并定为“三种人”了？

类似的问题在蓝天野、罗琦著《烟雨平生蓝天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本文转引自《读书文摘》2015年第10期摘录的该书内容《我的“文

革”十年》)中也能见到。其中写到,1966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两个青年女演员写的一张大字报,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说成是修正主义“大黑窝”、“大染缸”,具体例子是北京人艺曾演过法国古典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认为剧中有句台词是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天野觉得这完全是胡扯,当时也在看大字报的年轻编剧梁秉堃就提议写张大字报反驳,蓝天野答应了,第二天梁秉堃就写出了大字报,而且把蓝天野的名字署到了前面。这就成了蓝天野攻击“第一张大字报”的罪行。“6月中旬,开始有外单位的人到北京人艺来造反,造反派之间互相支援……”“6月14日的晚上,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来声援‘受压’的北京人艺造反派”,说蓝天野是“围攻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闹得人艺的人基本上一整宿没睡,第二天蓝天野原要为河北梆子剧团排戏也取消了。梆子剧团的一位副团长对他说:“蓝老师,你赶紧走!北京市文艺界的造反派知道今天这儿要排戏,文化局领导还要来审查,特别是你要来,所以今天上午要来造反,你赶快走!”“这时,北京市造反的声势已经很大,北京人艺也是一片混乱。按说,‘文革’造反的对象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就是掌权的嘛,可我从来没当过‘官儿’……”

这段记叙里,明显弄错了文革中具体的历史阶段。1966年6月,还没有明确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前“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有此提法,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直到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里才正式提出来的),在6月份的时候,提法还是批判各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艺界主要是批判由上级党委划定的“黑帮”、“黑线”、“反动学术权威”,当然也没有“造反”的提法,更无“造反派”的称呼。在那个阶段,北京是由改组后的新市委掌权,文化部是由以代理部长、党组书记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为首的军人掌权,各单位的活跃人物基本上都是党委和工作组领导下的“革命积极分子”或“革命左派”。

在1966年6月,北京文艺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从以下大事记可以略有了解——

6月4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刘芝明向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传达关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问题的报告,点名批判周扬、许立群、姚溱的“罪行”。

6月8日至12日,由解放军组成的文化部工作队先遣组进驻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

6月13日,文化部政治部发出《关于迎接工作队的通知》,称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要各单位组织群众热烈欢迎。同时,文化部文化革命小

组自上而下设立了一套领导班子，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行政领导系统。

6月14日，文化部工作队开始陆续进驻文化部所属53个文艺单位。

6月15日，文化部党组召开工作队全体队员大会，萧望东作介绍文化部阶级斗争情况报告，称文化部与解放前的上海四马路（藏污纳垢之地）一样糟糕。

同日，中宣部派工作组进驻中国作协、中国京剧院等文艺团体。

6月16日，文化部文革领导小组将司局长以上及各单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500余人集中到北京西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批判和交待问题，称之为文化部文革的“主攻战场”。集训班主任是文化部副部长、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各组组长、副组长均是军队干部。

6月20日，萧望东主持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作为中央66号文件由陶铸加上按语于26日批转全国（滑稽的是，后来一些文章里称这个文件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该文件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提出要派强大的工作队来文化部，“把司局长以上各单位领导干部，以及重要业务骨干，调离领导岗位集中起来，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理。”对文艺队伍要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对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要采取清洗、调换和留下三分之一的组织措施。（以上大事记内容综合了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7年6月编印的《建国以来文化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纪要（1949—1967初稿）》等资料的内容。）

显然，在1966年6月，包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内的北京文艺界，还在各级党委（党组）和工作组（工作队）的掌控中，所发生的批判、斗争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开展的，而不是造反派自下而上闹腾起来的。

除了把文革初期党委、工作组执政期间所做的事说成是造反派所为以外，还常见一些著述中把造反派组织已经撤销，造反派已在遭受清查、打击时期，由工宣队、军宣队、军管会以及先由军人后由老干部主政的革委会等做的事说成是造反派所为。这类问题都是不了解文革历史真相或有意混淆视听而造成的。

“文化大革命”与引号

许多年以前，新闻出版署曾有过一个规定，要求出版物上凡提到“文化大革命”都必须加上引号（有人说这是胡乔木的要求），而“文革”一词加不加引号，则没有严格规定。此后，所有的出版物上便都按照这一规定办理。

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名词，加不加引号，本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一旦成了主管部门的规定，为了避免或减少出版物上的“差错率”，有的编校人员

为了省事，便干脆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都统统加上引号。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法就造成了一些怪现象，特别是在有关文革的著述中引用历史文献中的文字时，原文中的“文化大革命”或“文革”也被加上了不该加的引号。比如，在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阎长贵（曾任江青的首任秘书）和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中——

29页，引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文字中，这句话被排成：“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

32页，引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的文字被排成：“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39页倒数第一行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时，把这个历史文件的名称排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71页，提到1966年10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时，将这个文革中的重要文件名称排成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95页，引用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上的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将其中文字改排成：“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

207页第7行，提到当年一份红卫兵编印的资料名称时，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改排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

……

该书中的这类问题还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看出，这本书中凡是引用的历史文献中的文字和提到的历史文献的名称，只要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名词，都不由分说地被统统改排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更让人无语的是，这本书发行量大，2009年4月第一版之后，仅仅半年，在当年10月就又发行了第二版，在第二版里，这些错误仍然照旧！

这样不应有的错误，显然不是两位作者写错，而是出版社的编校人员改错的。类似问题也不是近年才有，而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早在1999年出版的徐友渔的文革回忆录中，有一处“难道不是他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就被编校人员把引用的毛泽东语录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见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4—5行）。

除了这类错误外，还有的编写或编校人员为图省事，见到“文革”一词就加上引号，以致把文革中众所周知的专门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也改排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十分荒唐地把这个专有名称中的“文革”二字加上了引号。比如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部资料，2005年）一书中，就有：（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73页倒数1—2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0页第1—2行）……令人不解的是，此书的编写者还是专业的省级党史研究室。

“马来亚”与“马来西亚”

《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发表了陈益南的文章《设在中国的马共电台》，详细介绍了文革中设在中国湖南境内的马来亚共产党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前后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从当年的“输出革命”（而且是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式革命）到改革开放后停止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变化。可是，文章发表时，其中所有的“马来亚共产党”，竟都被改成了1983年以后才出现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马来亚”变成了“马来西亚”。据陈益南告知，《炎黄春秋》发表他的文章时给他看的排版清样，对他文中所写的马来亚共产党等历史名词并未作改动。杂志正式出版后，他才从寄给他的样刊上发现多处“马来亚”被改成了“马来西亚”，显然是在开印之前的最后校对中才被改动的。这又是不了解历史情况而造成的错误。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而马来西亚，却是在1963年9月才由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联合建立的一个新国家，起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因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于1965年8月退出联邦成为独立国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后就与英国殖民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1941年日本侵占马来亚后，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进行武装斗争。二战结束后日本投降，英国殖民统治者重返马来亚，承认了马共为合法政党。1948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宣布马共为“非法”，马共又转入“地下”，于1949年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57年马来亚独立（陈文中的这一处在《炎黄春秋》杂志出版时被改成了“马来西亚在1957年获独立”）。马来亚独立后，按说这一“民族解放”的使命即已完成，马共一度提出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但随即又在“马来亚民族解放战争十周年”的纪念宣言中要求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悬崖勒马，改弦易辙”，立即停止反人民的政策。以后中、苏两党大论战爆发，

马共又站到了鼓吹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共一方，谴责提倡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从而得到中共对其武装斗争的大力支援（包括在中国境内为其设立大功率广播电台进行煽动颠覆该国政府的宣传）。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后的前三十余年里，根本就没有“马来西亚”这个名称出现。在马来西亚这个新国家刚建立时，不但马来亚共产党不承认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承认它，当时与中国非常亲密的印度尼西亚也拒绝承认马来西亚，认为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印尼与马来西亚两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苏加诺被军人政变搞下台后，两国关系才得以改善）。

直到1974年5月31日，中国政府才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而直到中国已经停止支持马共武装斗争之后的1983年12月5日，才由1970年10月自马来亚共产党分裂出去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和1974年8月1日分裂出去的“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合并而组成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注：此一资料由胡泊先生提供）。在陈文所述的历史阶段中，还没有马来西亚共产党。

陈益南原文中，是按照不同历史情况分别使用了“马来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名词的。估计是不了解历史情况的年轻编校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以为是发现了差错，便自作主张将“马来亚”全部改成了“马来西亚”，结果反而造成了不应有的差错。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过文革经历的人，即使在文革爆发时只是初中学生，现在也都过了退休年龄。如今为出版物文字质量把关的，大多已是没有文革经历、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年轻编校人员了。如何防止在涉及文革历史的出版物中再出现类似的差错，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以上数例来看，编校人员不对自己不了解的文革历史细节和名词作擅自改动，应该是一个必须注意的原则。在文革研究者杜钧福的博客里有一篇文章《必须抠历史细节》，讲到一个例子：在季承所著《我和父亲季羨林》一书里，有一段话是：“‘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确确实实整理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版，87页）然而，《南方周末》报在发表该书中那一部分文字时，竟把这段话里的“共产党各级组织”改成了“造反派”！杜钧福在博客文章里写道：“我看了后觉得很可疑，因为文革初期还没有造反派，造反派也无从整‘大批群众的材料’，遂写邮件向该报编辑部质疑此事，无回答，又写了博文《质疑季承先生》。但是后来我看了季先生的书，才知道‘造反派’

在书中是‘党组织’……”他感叹这样的篡改“实在做得太恶劣了”。但愿这样的恶例不要再出现。

【编读往来】

李嘉邻谈 57 期周文川交代材料

读了 57 期上周文川的《一个中专学生对武斗与“现反”言论的交代》，心情很沉重……文革耗去了作者宝贵的青春，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历经磨难，他最终平反落实了政策，还了一身清白。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故事的人。这个材料是他青年时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思想的记录，也是他人生中交付的一笔学费和积累的一笔财富。这是一份难得的资料，非常宝贵。作者能够无私地提供出来供人们研究，实在不容易。向他致敬！